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爱国主义者和农奴制度的激烈反对者。列宁曾称他是“卓越的俄罗斯作家”。

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经历了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漫长时间。他的作品，敏锐地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从封建农奴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成为俄国解放运动的艺术编年史。不仅对俄国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他一生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歌，剧本，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和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烟》、《父与子》、《处女地》等。

屠格涅夫的一生

“上岛国去”

伊凡·谢尔盖也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俄国姆岑斯克城附近的一座豪华的庄园里。他七、八岁时，总跟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在一起。他们从小就有家庭教师教课。课后，他俩特别喜欢一种游戏，就是“上岛国去”。兄弟两人各占一“岛”，自称国王。两岛之间发生了战争，互相攻击，各有胜负。他们甚至还绘制出一幅岛屿地图。伊凡从小就表现了写作才能，被委托编写两岛的历史，他真的把一个厚厚的练习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战斗的时候，兄弟俩常常真的互相打得伤痕累累；一停战，又互相小心地用海绵擦去对方脸上的血迹。

但是，他们的游戏常常遭到母亲野蛮的干涉。

屠格涅夫的母亲瓦尔瓦拉，是拥有五千个农奴的地主。父亲谢尔盖依·尼古拉耶维奇曾在沙皇军队里任上校军官，一八二一年辞职，不大过问家事。母亲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这座庞大的庄园是她的财产。瓦尔瓦拉像一头狂暴的母狮，离了发号施令，就不能生活。她在家配了三百多个仆役，仆役们穿着都很讲究，但只要稍不遂她的意，就要遭到严惩。瓦尔瓦拉可以为一次桌子未擦干净，将打扫房间的女仆，弄得抛夫弃子，赶到遥远的农村去养牲口；只要偶尔发现一朵花被人摘了，她就可以下令把全体园丁抓到马厩鞭打。家庭医生每天早上必须给她检查身体，并写报告表送到莫斯科请大夫审核。当霍乱流行的时候，她就坐着带有玻璃罩的轿子，去巡视庄园。她简直是这座庄园的暴君。

她依照沙皇专制政府的机构，在家里建立了一套特别的秩序。她有“宫廷”、“大臣”和“警察”。管家——宫廷大臣——必须按时到她的宫廷去汇报；汇报前先得站在门口静候，然后才报告。家里一切事情都得按一定的时间进行，甚至瓦尔瓦拉喂的鸽子也知道时间：正午十二点，钟铃一响，便“扑嗤”飞到一块儿啄食。

瓦尔瓦拉也像喂养鸽子一样，给小伊凡们规定了生活时间表。每天早上十点整，她派秘书给家庭教师送去“手令”，对孩子们的学习时间作了严格的规定，教师不敢有丝毫变动。一切事情都瞒不了她，她有自己的“秘密警察”；一个整天摇头晃脑的老妇人，就是秘密警察的首领。孩子们对她又怕又恨；只要她挑唆一句，母亲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责打孩子。

有一次她责打小伊凡，伊凡苦苦哀求，要她说明为什么打自己，可是母亲只是反复地说：“你自己知道！”伊凡怎么也想不出自己的过失。第二天

他又被打，母亲还说一直要打到他认罪为止。在争夺岛国“战争”中的勇士小伊凡，在母亲的暴虐下，并没变成循规蹈矩的鸽子。他咬了咬牙，决心真的逃到“岛国”去，脱离这牢笼。好容易挨到深夜，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摸着从走廊走向前厅。这时，家庭教师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拦住了他。伊凡放声大哭，说实在不愿在这个家里呆了。教师设法安慰孩子，并保证他不会挨打了。

不过伊凡不久又挨了打。当时著名的寓言作家德米特里耶夫到屠格涅夫家作客。伊凡平日喜欢朗诵诗歌，母亲叫他朗诵一首德米特里耶夫的寓言。伊凡十分生动地朗诵了这篇寓言，接着他大胆地说：“您的寓言很好，但克雷洛夫的寓言更好。”德米特里耶夫大笑起来，母亲十分尴尬。客人走后，母亲把他痛打了一顿。

小伊凡虽然没能真的逃到岛国去，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屠格涅夫家的住宅，规模宏大，四十来间有圆柱装饰的房子，掩映在花木之中。这里有高大的藏书楼和剧院，还有一座很讲究的花园。这个花园，也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一样，曾是小伊凡的乐园。他和老仆人费陀尔交上了朋友，他们常常瞒着大家溜到花园里去。只要费陀尔做一个手势，或向花园点点头，小伊凡总能找到借口跑出来。他们在花园里有几处心爱的隐秘的地方，树林和灌木丛掩护他躲开了整个世界。花园里各种小鸟都在歌唱；每一片树叶，每一片芦苇，也都在低声吟唱。小伊凡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心想，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了。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欢乐的“岛国”。

他们并排坐着，一边听着大自然的乐章，一面讲着古代英雄的故事。老仆人记得许多古代优美的诗歌，他特别喜欢俄国古典作家赫拉斯科夫的长诗“俄罗斯亚特”，不只一次给伊凡朗诵。老仆人真会朗诵，诗的清泉，从老人的口里，潺潺流入小伊凡的心田；小伊凡被这些诗句迷住了，也经常朗诵这些诗，甚至还试着要写诗了。然而在屠格涅夫家里，对于诗，特别是俄国诗，大家都抱着鄙视的态度。小伊凡不得不瞒着母亲，不让她知道自己对诗的爱好和与老仆的友谊。老仆人是他真正的启蒙教师，为他以后踏上文学道路播下了良种。

伊凡九岁那年，家里决定让孩子们到莫斯科去正式上学。他们家也从老家斯巴斯基搬到了莫斯科。伊凡和哥哥尼古拉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孩子们以前一直很少离开家乡，到了莫斯科自然感到新鲜和兴奋。但伊凡又很想念斯巴斯基，想念那里的花园和他在农村的朋友，尤其是老仆人费陀尔。农村每年两次把食物——黄油、面粉、宰好了的飞禽——用雪撬运来。又冻又饿的车夫卸掉贡物就钻进厨房，不慌不忙地，唉声叹气地谈着农村的新闻。伊凡时时偷偷地溜进厨房里去，兴致勃勃地倾听他们的谈话；在心里重温着他在农村的生活。

母亲曾在小伊凡的心灵上投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而老仆人却用自己的智慧将小伊凡带到一个诗的境界里。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对屠格涅夫以后的生活道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会开枪的”

屠格涅夫在寄宿学校上学的时间不长。到十一岁，家里就把他叫回去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十五岁那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这时，幼年时矮小瘦弱的伊凡已经长高了，像成年人一样，两肩长得很宽大，显得很结实。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大学只学了一年，一八三四年秋天，

他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历史系。

他家这时也迁居到彼得堡。父亲在晚年经常生病，搬家以后不久就逝世了。屠格涅夫很少在家；新的朋友，新的大学生活，把他的全副精神都吸引过去了。

在大学里 他喜欢同一些小官吏、职员和平民的子弟接近。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大学生的集会：在城郊的某一个地方，在木房的顶楼上，几个青年人围着蜡烛争论。先进的学生纷纷结成小组，讨论着俄国社会发生的问题和祖国的未来。这些小组的领袖，有不少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当时在青年中影响极大。与他们的交往，开拓了屠格涅夫的眼界，使他吸取了新的精神营养。

在屠格涅夫上大学期间，母亲每到初春，总要回到斯巴斯基去。过后不久，屠格涅夫也回去度假。母亲照常大抖她地主的威风。屠格涅夫经常带着自己的一条狗出去打猎，往往从清晨到深夜，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和草原上奔跑。这不仅使他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人民的生活。他用上大学汲取的思想，来对照农村的现实，“怎么生活？”——这个问题就愈来愈频繁地困扰着他，他越发不能容忍母亲的暴行。

夏天，有一次他陪几个客人在房里谈话。母亲在隔壁书房里听取秘书洛巴诺夫的报告。突然，书房里传出母亲愤怒的尖叫声。屠格涅夫站起，从敞开的门口，看见母亲扬起摆在桌子上的马鞭，抽打洛巴诺夫。洛巴诺夫一闪，从她手中抢过马鞭扔到墙角去了。瓦尔瓦拉吃了一惊，愣了一阵之后，她按铃叫人把洛巴诺夫抓了出去。一会儿，洛巴诺夫又被带回来，已经换了灰色的农民服装和树皮鞋。对他的判决是：放逐到最遥远的乡村，妻子和三个孩子留在斯巴斯基。

这是多么残忍的判决啊！屠格涅夫冲上前去，百般劝解，却毫无结果。眼看着在这里操劳多年的洛巴诺夫就这样被赶走了，屠格涅夫浑身都要爆炸了，他双手抱着脑袋，“天啊，多惨呀！”他边跑边喊冲出了房间。

寒假回家，他又听说母亲要卖掉一个年轻的女仆路莎。他马上对母亲说，买卖奴隶是野蛮行为，他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把这位姑娘藏到一个可靠的农民家里。买主控告屠格涅夫煽动农民“谋反”。为了平定“谋反”，县警察局长纠集了一些人，叫他们每人拿一根粗棍，去搜抢那个姑娘。屠格涅夫没有被他们吓倒，他站在房子的台阶上，拿枪迎向他们，坚决地说：“我会开枪的！”

“我会开枪的！”象一声惊雷，震响在这农奴主的领地上。那些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了，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世袭贵族地主的后代会喊出这样的话，他们后退了；路莎没有被卖掉。但是，等到屠格涅夫一离家，母亲又任意摧残虐待这个姑娘，报复她不听话的行为。

这件事使屠格涅夫非常痛心，他当时发誓永远不当地主，永远不管治农民。但这有什么用呢？像瓦尔瓦拉这样的地主在俄国还不到处都是吗？他决心寻求这罪恶的根源。

屠格涅夫的时代，是俄罗斯社会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野蛮的农奴制是罪恶的根源。在屠格涅夫八岁那年，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沙皇政府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了。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但它揭开了与农奴制斗争的序幕。屠格涅夫一八三七年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刚满二十岁的屠格涅夫出国到柏林大学深造。一八四一年回国后，他更广泛

地接触了社会生活。深刻地认识了俄罗斯社会的症结，他由当初厌恶母亲的暴行，发展到仇视整个农奴制度。没有正义，没有真理的俄罗斯社会，使屠格涅夫感到窒息，他越来越感到无法和他所憎恶的社会垃圾生活在一块……

他又一次决定出国。他后来回忆起一八五七年初他出国前的心情说：“我一定要离开我的敌人，为的是能从最远的地方更猛烈地攻击它。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敌人已经具有鲜明的形状，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名字，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在这个名字下，我搜集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东西，我立誓永远下妥协……这是我的‘汉尼巴誓言’，当时这样立誓的并不止我一个人。”

找出自己的道路

要同农奴制度决战到底。屠格涅夫立下了这样的钢铁誓言。他用来攻击这个敌人的武器，并不是他曾用来保卫过女奴的枪，而是手中的笔；他以文学作为武器。然而，屠格涅夫走上文学道路，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的。

“怎么生活？”这是屠格涅夫多少年来一直思索着的问题。上大学的时候，他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幻想：他一会儿打算做教育家，做教授；一会儿又准备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历史、古代语言，特别是哲学，学得非常出色。一八四一年他从柏林回来，就躲在莫斯科住宅的楼上，着手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但当时莫斯科大学没有哲学教授，没人主考。他就动身到彼得堡大学，在那里通过了学位考试。也许教授、学者的桂冠就在前面等待着这位有为的青年。但是不久，他对科学工作就越来越冷淡了。

学位考试后，他在母亲一再坚持下，也到官场去作了一次尝试。但很不成功，不久上级“劝告”他辞职。他带着轻松的苦笑离开了衙门。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惋惜，他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进官场。

他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这当然与他从小就热爱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童年时代就从老仆人那里接受过民间文学和诗歌的熏陶。在大学里，他阅读和谈论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有时深夜他从什么集会回到家里，悄悄地走进卧室，却不忙着上床睡觉。蜡烛在黄铜烛台上淌油，窗口已透进曙光，但他仍坐在桌旁写诗或剧本。有一次，他将自己写的一个剧本，送给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普列特涅夫看。教授对他的剧本很冷淡，并在课堂上不点名地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剧本。可是当天放学的时候，教授在街上碰见屠格涅夫却又说，不管怎样，作者“还有点儿小才气”。这句话鼓起了作者的勇气，于是又交了几首诗给教授看，教授挑出了两篇，一年以后发表在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以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几乎都与这个杂志联系在一起。

促使屠格涅夫坚定地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引路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

屠格涅夫在大学时，就如饥似渴地读过别林斯基的文学论文；他们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初。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的叙事诗《巴拉莎》出版了。他动身从彼得堡下乡的那天，到别林斯基家里去了一趟，留下一册自己的作品交给他的仆人，并没有说明自己是谁就走了。他在乡下呆了近两个月，一天忽然收到一份五月号的《祖国纪事》杂志，其中有别林斯基对《巴拉莎》中肯评价的长文。屠格涅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的朋友来祝贺他时，他连连摇手，一口咬定那不是他的作品。回到彼得堡后，他抑止不住自己，

于是立即去拜访别林斯基。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这对屠格涅夫的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晚年回忆说：“当时我有过许多打算……不久我认识了别林斯基……动手写诗，过后写散文，至于全部哲学，以及当教育家的计划和打算，就都被搁在一边了：我全心全意献身于俄罗斯文学。”

别林斯基在当时最进步的《祖国纪事》杂志社工作，几乎所有进步的俄罗斯作家，都同他有着亲密的关系。屠格涅夫几乎每天都到别林斯基家去，就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作家。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变得更加严肃、朴实。几年内他写出了被别林斯基称赞为有才华的好作品《地主》（叙事诗）等。但这个时期，屠格涅夫的作品还没有摆脱模仿普希金、果戈理的痕迹，他常常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一度想放弃文学工作。

一八四七年初，屠格涅夫在去巴黎的前夕，曾给《现代人》杂志留了一篇故事：《霍尔和卡里内奇》，作为向文艺界的最后献礼。编辑给它加了个副题：“猎人笔记之一”，放在“杂拌”栏中刊出。这篇小说以热情而真实的笔调描写了在农奴制度压迫下的农民的优美品德和超人才干。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描写过农奴制度下的农民。

屠格涅夫在国外收到了刊载他这个短篇的《现代人》杂志（复刊第一号）；不久又收到别林斯基的来信：“您自己还没有了解，‘霍尔和卡里内奇’到底是篇什么样的东西，……根据‘霍尔’来看，您的写作前程无量……找出自己的道路，了解自己的地位——对一个人来说，这就是一切，这就是说他掌握了自己的未来。”

“找出自己的道路”，这是屠格涅夫长期探索的问题；现在别林斯基从他的步履下看到了这条路，并及时揭示给他。他相信别林斯基杰出的眼光，这个人只根据作家走上文坛的最初的步伐，就能大致无讹地观察和预测他的前途。于是屠格涅夫又满怀信心地回到了文坛；最后的献礼，成了他扬帆远航的信号。

这年的春天，别林斯基到德国治病。屠格涅夫专程从巴黎赶到柏林迎接他，陪伴他到德国境内的一个疗养地查尔茨布鲁尼。患病的别林斯基，精力仍很旺盛，他不倦地给屠格涅夫和别的俄国朋友讲彼得堡的新闻和国内形势，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农奴制，每一个正派的俄国人都应该和它斗争。当时，屠格涅夫正是以这个为主题，继续进行着

《猎人笔记》的创作。

这天，屠格涅夫特别愉快地给别林斯基朗诵了他的短篇《村吏》。这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宾诺奇金这个教养良好的青年地主，只因为葡萄酒没有烫热，就下令“照例”鞭打仆役的文明假相。别林斯基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说，“多刁钻的恶棍！”接着默默握住屠格涅夫的手。这篇和同时写成的《办事处》，随即寄给涅克拉索夫，登在《现代人》杂志上。

这段接触，使屠格涅夫对别林斯基了解得更多，对他的钦羡依恋之情也更加深厚。他常常说，他一生有两个真正的朋友：俄国的别林斯基和法国的福洛贝尔。

秋天，别林斯基回俄国去了。屠格涅夫仍回巴黎。不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迎头卷来。他和赫尔岑走上硝烟弥漫的巴黎街头，看到了第一批街垒是怎样筑成的，也看到了起义者的战斗和牺牲。他将对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资产阶级的愤恨，凝聚在笔端，特别勤奋地创作，差不多每周都有作品寄给《现代人》杂志。

一八五〇年夏天，屠格涅夫回俄国。母亲对他当作家大为不满，要求他重入官场，结婚，按照贵族的身份来处世为人。这年秋天，母亲去世了。于是屠格涅夫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立即解放家奴，让他们自由；根据一部分农民的志愿，把他们改为缴纳租税的佃农。他尽力为他们做一切他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在家乡住了不少时间，常常打猎，仔细观察农民的生活，用从生活中获得的新资料，继续着《猎人笔记》的创作。

一八五二年，《猎人笔记》经过作者增订，分两卷在莫斯科出版。这部作品，不仅是俄罗斯十九世纪乡村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也是屠格涅夫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的基石。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猎人笔记》出版不久，俄国教育大臣曾向尼古拉一世呈上一份特别报告书。他说，这部书中“绝大部分文章带有消灭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而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沙皇恼羞成怒，接受教育大臣的建议，将批准这部书出版的图书审查官撤职了。

而人民却非常欢喜这部作品。有一次屠格涅夫在一个小车站的月台上，碰到两个青年。

“请问，”其中一个问他，“您是不是屠格涅夫？”

“我就是。”

“就是写《猎人笔记》的那一位？”

“就是。”

两个人都摘下帽子向作家深深鞠躬。

“向您致敬。”其中一个说，“以俄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

屠格涅夫已成为人民拥戴、敌人惊恐的作家。

流放者的耳房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屠格涅夫的良师益友别林斯基与世长辞了，他心痛欲裂。他没有辜负别林斯基的教导，从此，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堡垒《现代人》更接近了。

法国革命失败以后，俄国也陷入空前黑暗之中。尼古拉一世被国外的事变吓破了胆，法国人被禁止入境，外国报刊一概禁止订阅；对国内人民，滥施淫威，动不动就逮捕和流放。为防范文坛“危害思想”，还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到处搜查地下传单和禁书，拆阅私人信件，指使告密。《现代人》杂志也陷入困境——沙皇政府对它特别怀疑；多少检查官都睁着带血丝的眼睛盯着它。正在这时，一八五一年，屠格涅夫毅然参加了《现代人》集团，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站在同一战壕，以笔做刀枪，向俄罗斯黑暗世界开火。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果戈理逝世了。这是继别林斯基之后，俄国文学界的又一巨大损失。屠格涅夫回想起几个月之前，还在莫斯科拜访过这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情景，心情十分沉重。他在纪念果戈理的文章中说：“果戈理去世了！哪一个俄罗斯心灵不为这个消息所感动？——他去世了……”他用自己的文章，表达了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俄罗斯人的心声。但这篇文章，却被彼得堡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屠格涅夫趁莫斯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将它寄到那里，刊登在《莫斯科新闻》上，署名屠……

夫。第三厅马上传讯屠格涅夫。因为当时沙皇政府禁止写文章纪念果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猎人笔记》的出版，使沙皇政府大为恼火。特务机关第三厅逮捕了屠格涅夫，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先监禁一个月，然后遣送回老家，交地方官看管。

屠格涅夫被捕了，送进了警察局的“暂押所”。隔壁就是专门鞭打“不法”农奴的地方，那皮鞭的嘶叫声使屠格涅夫坐立不安。幸亏几天以后，看守的女儿们请求父亲，把这个高贵的犯人移到她们住宅中一间干净宽敞的房间里，当然，这是因为她们崇拜作家的天才。

屠格涅夫的被捕，在彼得堡引起了人民很大的愤慨。同志和熟人纷纷去探望他，警察局前面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马车。但很快就禁止了这种探视，把他一个人孤单地留在那里。一个月以后，正值初夏，屠格涅夫被流放回到故乡斯巴斯基。他住在叫做“流放者的耳房”的小屋里。在这里，虽然比在“暂押所”自由些，常常有客人来看望他，邻居们起初怕与他接触，慢慢地，也不断来拜访他了，但这毕竟是画地为牢式的囚禁，不准他走出这个圈子。

流放者的耳房，能关住他高大的身躯，却关不住他奔放的思想。他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流放使他更懂得自己战斗的意义。从流放的最初几天开始，屠格涅夫就投入了工作。但当时他不知道他的作品是不是准许出版，《现代人》的主编涅克拉索夫很快写信告诉他：“我们打听了你的事情，他们说，你可以写作……”于是，他一边在他所熟悉的乡村，努力研究俄国人民，一边写些短篇，为创作长篇小说作准备。

他常常在那荒芜的花园里散步。有时也去打猎。可是，被流放的作家步步都有人监视，他身后总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个人”。屠格涅夫称他是“警犬”。这家伙奉命监视作家，而且向上级呈送这样的秘密报告：“他去打猎。他的样子威武得很。在田里站住和农民谈了很久关于自由的事，但当我向他走过去，摘帽行礼的时候，伊凡·谢尔盖也维奇顿时做出好像看到魔鬼的样子，变得十分地严肃……”区里的警察局长也每月来“勘察”一次，但屠格涅夫总是用十个卢布的酒钱，把他打发走。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巧妙地争取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机会。乡居生活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他十分珍惜这段流放的生活，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做出这么多工作，而且做得像目前这样轻松。”

“流放者的耳房”是屠格涅夫创作史上的里程碑。他获得自由以后，每出国一段时间，有了什么大的创作计划，总要回到这里来完成。这“流放者的耳房”特别能使他懂得创作的意义，给他以巨大的创作动力。他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等长篇小说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一八五三年底，屠格涅夫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到彼得堡，受到朋友们的热烈欢迎。《现代人》编辑部盛筵迎接他的归来。宴会上，涅克拉索夫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诙谐的颂诗。诗的末尾两句话说：

爱他满头的苍苍白发，
但却有一颗十分年轻的心灵！

这时，屠格涅夫才三十四岁，头发却差不多都已变成银白色了，所以大家开玩笑叫他“年轻老人”。但是，他的性格十分开朗、直爽，任何寂寞的编辑室，只要这位身材高大，表面有点笨手笨脚的作家出现，就立即变得活跃起来。

屠格涅夫的名誉与日俱增，他已成为全俄罗斯瞩目的作家。他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以加倍努力的创作，来报答人民给予他的荣誉。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有一次，屠格涅夫家领地附近的一个地主卡拉捷耶夫，要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参加战争。他认定自己会战死，便把自己的一本笔记转交给屠格涅夫，请作家加工润色，改写一部小说。

当晚，屠格涅夫就看完了这本笔记，它记述一个俄罗斯姑娘和一个保加利亚革命家的爱情故事。内容动人而凄惨，文字也很好，只是写作技巧欠缺。卡拉捷耶夫也爱上了这位姑娘，但不久她认识了那个保加利亚人。这个保加利亚人全神贯注在一个理想上：从土耳其的统治下把祖国解放出来。俄国姑娘为他的理想所感动，爱上了他，并同他一起到了保加利亚；可是不久，这位保加利亚人死去了。

这个故事，在屠格涅夫脑海中藏了数年，他正在孕育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的一些长篇或短篇的作品，基本上都在生活中有它的原型。那么，要将这对青年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谁是时代的主人？屠格涅夫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这期间，屠格涅夫为寻找时代的正面人物，先后创作了《罗亭》和《贵族之家》两部长篇小说。

《罗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小说主人公罗亭是一个聪明、热情而又善辩的人。故事一开始，当他出现在三等文官夫人拉松斯卡娅的客厅时，就以雄辩的口才，吸引了周围人们的注意。他说的每句话，都燃烧着信仰的烈火。他知道怎样去拨动人们的心弦，唤醒人们崇高的感情，引起他们对行动和斗争的渴望。他追求真理的火焰从未熄灭，并能够在别人身上点燃这种火焰。在这里，他首先在拉松斯卡娅的十七岁的女儿娜达莎身上点燃了这种火焰，也点燃了沉睡在她心中的爱情之火。但娜达莎的母亲宁愿让女儿死去，也不同意她嫁给这个没有家产，没有声望的穷贵族罗亭。娜达莎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心抛弃家庭跟他出走，因为她相信罗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负有为人类未来造福的神圣使命。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罗亭竟拒绝了她，让她“服从命运”，回到母亲的身边去。他在命运面前竟是这样卑躬屈膝，这样怯懦驯服。娜达莎这才醒悟到她看错了人。她在和罗亭分别时感慨万分地说：“我痛苦的是我对你失望……服从，这就是你对自由和牺牲所发出的宏论的实际运用。”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罗亭性格的本质：虽有高尚的志愿，却不能从事实践活动。他只不过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罗亭离开娜达莎之后，到处漂泊。他曾力图改革他所憎恶的现实社会，却始终一事无成：他的疏通航道的计划，因遇到磨坊主的反对而破灭；想在农村推行农业学教育也不了了之；打算对乡村学校教育实行“根本改革”的企图也因校长的因循守旧而告失败。应该说，罗亭的这些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活动，在当时俄国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却一事无成，他终于在一八四八年巴黎革命的巷战中牺牲了。罗亭的失败，一方面由于他远离人民，缺乏行动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俄国没有具备发展个性，发挥他的才能的良好土壤。高度发展的天才同压抑天才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使得自由主义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像罗亭那样“聪明而不中用的人”或“多余的人”。

罗亭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彼却林等“多余的人”形象

的发展。屠格涅夫一方面肯定了他追求真理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批判他缺乏实践能力的弱点；一方面同情他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他承担不了改造社会的使命。罗亭的形象表明了，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只有从事于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发挥进步作用。

《贵族之家》写于一八五八年，一八五九年在《现代人》第一期上发表。

《贵族之家》以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拉夫列茨基和罗亭一样，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但他同罗亭不尽相同，他渴望接近人民，要用自己的工作来改善农村贫困的现状，努力寻求新的生活道路。当他与放荡不轨的妻子决裂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聪敏、善良的少女丽莎。他们互相爱慕，拉夫列茨基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灵，深深地吸引了丽莎。丽莎也堪称拉夫列茨基的同志，她的心也是向着俄罗斯人民的。每回当她母亲领地的庄头到城里来的时候，她总要和他全无矫饰地谈上几个钟头的话，完全像对待平等的人似的，绝没有领主的矜持。这正是他们之间爱情发展的基础。丽莎的青春的爱情火焰，点燃了拉夫列茨基对生活的欲望，坚定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探求。后来，当他得知妻子的死讯时，便决心同和他相爱的丽莎结合。然而，正当拉夫列茨基陶醉在这无边的幸福中的时候，他那堕落的妻子却像幽灵似的回来了，原来她并没有死。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地摧毁了拉夫列茨基美好的幻想。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是选择他与丽莎结合的幸福，还是选择对妻子儿女的义务呢？他进退维谷，终因不能与传统观念决裂，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丽莎因此进了修道院，为了向上帝赎罪而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

八年过去了，拉夫列茨基又来拜访丽莎曾经住过的那个“贵族之家”，看到老年人早已进了坟墓，他自己年纪也大了。一切理想、希望都已破灭，只有回忆是他唯一的乐趣。无论什么也激不起他的热情，他只是平静地等待着生命的完结。屠格涅夫带着深沉的惋惜，描写了拉夫列茨基孤独的命运和无所作为的一生。在小说结尾，作者借拉夫列茨基之口悲痛而绝望地喊出了：“毁掉吧，无用的生命！”它表明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已消失殆尽，不能不被历史所淘汰。

在作品里，屠格涅夫满怀深情地把希望寄托于新一代。他通过拉夫列茨基传达了时代的呼声：“生长吧，年轻的生命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这年轻的生命在《贵族之家》中就是指平民知识分子、拉夫列茨基的大学同学米哈莱维奇。这个形象表明贵族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比他们更优秀的人物已经出现了。

《贵族之家》实际上是给正在崩溃的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屠格涅夫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优美而富有感情的大自然。文字清新隽秀，整个作品洋溢着浓郁感人的抒情气氛，给人以美的享受，产生了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

一八五九年八月，他回到故乡斯巴斯基，一鼓作气写成了长篇小说《前夜》。

《前夜》以卡拉捷耶夫的笔记本的故事为基础，塑造了一对平民知识分子：英沙洛夫和叶琳娜。他们为了祖国解放的崇高事业而坚定不移地投身到艰苦的实际运动中去。这与只有高尚的空谈，而无实际行动的罗亭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实践精神，正是当时俄国社会所普遍缺乏的。屠格涅夫总是用自己的著作，敏锐地反映俄国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不断以新的艺术形象

来刷新俄国文学史。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前夜》脱稿，屠格涅夫立刻回到彼得堡。他一连好几个晚上，给朋友朗诵这部作品。小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屠格涅夫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是这样。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但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青年大学生，都盛赞这部小说。杜勃罗留波夫为欢迎《前夜》的公开出版，预先专门写了长篇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杜勃罗留波夫特别称赞叶琳娜这个俄罗斯姑娘的形象，他预言当时社会需要的“俄国的英沙洛夫”即将出现，俄国社会即将出现大的变革。他满怀信心地说：“前夜是跟随之而来的白天相距不远的，隔开它们的只不过是一夜！”

屠格涅夫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就看到了它。他虽然承认杜勃罗留波夫有着真挚而高尚的心灵，也模模糊糊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却不大信任这个才离课堂不久的青年的眼力，固执地不同意他对自己小说的解释：难道《前夜》中竟说俄国处在革命的前夜？难道它在号召革命？屠格涅夫激愤地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在《现代人》上刊登这篇论文。涅克拉索夫多方设法和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屠格涅夫却尖锐地提出：“任你选择吧，或者是我，或者是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感到为难，但是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道出的真理，比与屠格涅夫的友谊更珍贵，于是他决定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八六〇年第三号《现代人》杂志上。屠格涅夫一气之下，与涅克拉索夫决裂了，并退出《现代人》杂志社，将小说转到《俄罗斯导报》上发表。

别林斯基的朋友，从小就仇恨农奴制度的屠格涅夫，也为自己脱离《现代人》而十分难过。他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一样，渴望祖国人民从农奴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但作为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在通过什么道路去解放人民这个问题上迷惘了。他希望用调和、缓慢的改革来实现这个目的。在思想深处，他甚至害怕农民革命，也不相信农民革命会成功，自然不会同意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那些革命主张。这正是屠格涅夫世界观的矛盾的反映。这些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早已流露出来，而在《前夜》中，暴露得更加明显，以致严重地影响到他后期的文学创作。

在与涅克拉索夫失和的日子，屠格涅夫并没有停止写作。他在写成自传式的中篇小说《初恋》之后，接着就以当时的自由主义贵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为背景，完成了另一部杰作《父与子》。虽然他在组织上已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脱离关系，但他仍以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为作品的主人公，真实地反映了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阶级的胜利。这显然是别林斯基和《现代人》的积极影响，还在顽强地起着作用。

《父与子》的发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舆论界的风风雨雨，使屠格涅夫陷于彷徨之中。与《现代人》的分手，使他失去了坚强的精神支柱。他感到有些疲倦了，于是又决定出国。从这时起，一直到逝世为止，他主要生活在国外，每年只回俄国过很短一段时间。在国外，他始终和波里娜一家住在一起。

波里娜是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早在四十年代，她就到彼得堡旅行演出

过，与屠格涅夫相识。此后，屠格涅夫深深地保持对她的爱慕，崇拜她惊人的天才。尽管母亲在世时，曾多次催促，屠格涅夫却终身没有结婚；他几乎始终跟随着波里娜。她是屠格涅夫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他每写一部作品总要念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在与法国作家都德、左拉、福洛贝尔等的交往中，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些年里，他还写成两部长篇小说：《烟》和《处女地》。

一八六七年完成的《烟》，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后期创作的危机。在作品中，屠格涅夫一方面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深刻地揭露了贵族阶级在政治上的反动，批判了贵族的道德堕落和精神空虚。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以政治侨民谷柏廖夫为首的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活动，把他们的改革活动比做一团烟一样，实际是否定了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屠格涅夫既看不到革命的力量，也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因而在小说中充满了悲观主义的情绪。

《处女地》是屠格涅夫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是经过七年的构思和写作，在一八七六年完成的。

七十年代，是俄国解放运动中民粹主义运动时期。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通过农村公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认为俄国主要的革命力量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阶级。为了发动农民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进步青年要到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八七四到一八七六年间发生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但由于民粹主义者脱离人民，最后以失败告终。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及其彻底失败，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屠格涅夫在《处女地》中反映了这个事件。这是他反映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的又一部艺术编年史。

《处女地》真实地揭示了俄国贵族反动势力和革命的民粹派两个敌对阵营的冲突。小说开始，作者就描写了民粹派运动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农奴改革的不彻底，广大人民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警察的压迫下呻吟，反动阶级则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这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乃是民粹派运动产生的社会原因。作品主人公涅日达诺夫是个贵族出身的民粹主义者。他正直、有反农奴制的热情，他带着强烈的愤恨大声疾呼：“俄国的一半都快饿死了。”为改变这不合理的现实，他离开了贵族家庭，到民间去宣传社会主义，鼓动农民起来参加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但是，他并不了解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理想、愿望，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他动摇了自己的革命信念，自杀了。屠格涅夫通过涅日达诺夫的形象，表明了民粹派运动的失败和没有前途。

作品扉页上的题辞，反映了屠格涅夫的创作意图：“要翻处女地，不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如果说屠格涅夫把民粹派青年涅日达诺夫之流比喻为仅仅是用木犁开垦处女地的人，那么，作品中的索洛明，则是用铁犁深耕处女地的人。平民知识分子索洛明，是一个勤劳、精明的工厂管理人，他为人民的幸福诚实地工作着。作者认为他是俄罗斯所需要的“人民公仆”之一。他反对保守的贵族，同情人民，同时他也反对民粹派的暴烈行动。他主张自下而上的逐渐改良。屠格涅夫认为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把俄国这荒芜的“处女地”开垦为良田。这充分表现了渐近论者屠格涅夫的阶级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屠格涅夫并没有将索洛明作为未来文学的主人，而是以

其对时代的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感到俄国文学未来的主人是索洛明的助手——工人巴威尔。作家朦胧地预感到工人阶级将登上历史舞台。他在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写道：“我应该更明显地表明未来的活动家巴威尔这一人物，但这一个极为巨大的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成为……新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可惜这样的人物终未在他的作品中出现。

《烟》和《处女地》在屠格涅夫创作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反映了他后期创作的状况。但其思想意义，是不能与他六十年代的作品相比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不行，我差不多经常远离祖国，我无法把俄国最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

屠格涅夫虽然远离祖国，与祖国仍是息息相关：他时刻思虑祖国的前途，倾听着祖国的声音；祖国人民也传诵着他的作品，他每次回国，许多人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来欢迎他。然而，沙皇政府始终敌视他。他一回国，就对他严加监视。他最后几次回国时，被禁止向大学生发表演讲，并且常常接到关心他的人们的劝告：速离首都，尽快出国。

一八八〇年，参加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像的揭幕典礼，是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国。这以后，他的病势日趋沉重，有时不得不一连好几个月困顿病床，甚至站立几分钟都不行；但只要稍微轻松一点，他就立即又动手写作，写出一系列小型的“散文诗”，作为向他时刻思念的祖国的最后献礼。

他在病危期间，曾请求一个朋友：“您去斯巴斯基的时候，请代为向我的房屋、花园和那棵年轻的橡树告别——代向祖国告别；祖国，我大概永远看不到它了。”

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屠格涅夫因患脊椎癌在巴黎逝世，终年六十五岁。他的遗体遵嘱运回彼得堡。九月二十六日，在沃尔科夫公墓举行安葬仪式。成千上万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了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葬礼。

屠格涅夫的逝世，在整个欧洲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作家纷纷作文哀悼这位文化伟人。一位德国作家在与屠格涅夫遗体告别时，提议在“洁白的大理石板上刻画一小段被粉碎的锁链”，作为纪念碑，来表彰屠格涅夫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的丰功伟绩。

屠格涅夫生前，人们曾多次请求他写一篇自传。他总是简略地提一提他生活中的一些表面的事实，有一次他干脆回答说：“我的全部传记都在我的作品中。”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们对上文就作家生平所作的简介感到不满足，那就请你们遵照作家的遗嘱，去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吧。

主要代表作品

《猎人笔记》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第一部成名之作。它写于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二年，内收二十二个短篇，均相继刊登在《现代人》杂志上。一八五二年，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

《猎人笔记》以“随笔”的形式，叙述了猎人（作者自己）在俄罗斯田原和山野行猎时，所见所闻的一些生动的故事。反对农奴制是《猎人笔记》的基本主题。这一基本主题构成各个短篇的内在联系。它像一条彩线串联起一颗颗夺目的珍珠，使《猎人笔记》的各个短篇集成一部完整的艺术珍品。

《霍尔和卡里内奇》是《猎人笔记》开卷第一篇，也是《猎人笔记》最好的篇章之一。

《霍尔和卡里内奇》是以两个农奴的名字作题目，他们是故事的主角。霍尔和卡里内奇远离尘世，在卡路格森林深处过着独立和富裕的生活。霍尔住在树林中的一所孤零零的松木房子里。这里很清洁，没有蟑螂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的黑甲虫躲藏着。这种较为优裕的生活环境，培养了霍尔和卡里内奇的特殊性格。屠格涅夫是用对比的手法来刻画这两个人物的。这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朋友，性格却毫无相似之处。霍尔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里内奇接近于自然。

霍尔是地主波鲁德金的佃农，他身体结实，有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前额，很像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是积极的讲求实际的人，有经济管理才干。他住在树林里的沼地上，这样可以远一点避开老爷的眼睛。他替自己盖了一栋房子，料理一切家务。他勤劳，不断地修理马车，支撑栅栏，检查马具，没有人比得上他的精明。他不但经营自己的土地，还多少贩卖些奶酪和柏油，建设起一个人丁兴旺、驯服和睦的大家庭。他有十个儿子，个个都是小霍尔，个子高大，身体结实。他有一颗能看透人心的慧眼，会脸上现出微笑而肚里做功夫。平时对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都很温顺，但他的心胸里却震荡着要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并默默地顽强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有志经商就是打算摆脱农奴制的桎梏，要做新生活的主人。

卡里内奇跟他完全不一样，身子很瘦，是一个性情愉快而温顺的人。他热爱大自然，对自然界的风云变幻，了若指掌。他的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淳朴憨厚。他没有家小，无依无靠，也没有家业，马马虎虎过日子，却无时不感到满意。他觉得住在这树林中挂满干燥香草的小屋里很惬意。嘴里不断地低声歌唱，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常常眯着淡蓝色的眼睛笑，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薄的、楔形的胡须。这神态，充分地显露出俄国普通农民的诗的天性。

看了这些，也许你会惊讶他们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不，即使在这树林深处也震响着农奴制的鞭梢声。卡里内奇虽然有一双“吉利的手”，什么都会做，但是得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没有他，地主波鲁德金先生一步也走不动。波鲁德金也承认他是一个热心而勤勉的农夫，但是“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牢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能够务农呢，你想。”

霍尔是二十五年前屋子失火时，以每年五十卢布的高价租金住进波鲁德金的林子里面的沼地的。靠着他的才干和勤勉才挣出眼下的局面。随着他经济条件的好转，农奴主的勒索也水涨船高了，波鲁德金说，他“富”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租金，我也许还要涨价呢”。并几次三番地对他说：“赎了身吧，霍尔，喂，赎了身吧！”霍尔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他说：“霍尔即使作了自由人，凡是没有胡须的人都还管得着霍尔呢。”没有胡须的人，在当时即是绅士、官吏。他知道，出了这个牢笼，会有更大的牢笼等待着他。虽然波鲁德金急于获得一笔可观的赎身金，霍尔却暂时不愿意离开这富饶的树林。

怎样才能摆脱农奴制的束缚呢？这是霍尔热切关心的问题。他找不到完美的答案，是不会轻易走出他的树林的。当霍尔听猎人说，他曾到过外国，这触动了他的好奇心。他感兴趣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按顺序发问：“他们那边也同我们这里一样的，还是两样的？……”猎人的叙述使天真的

卡里内奇惊呼：“啊！哦，老天呵，有这等事？”霍尔却沉思地锁着浓眉，只是偶尔说：“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哩，但这是好的——是合理的。”猎人说，霍尔凭借他自己的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和我谈了许多在别人是挨了拷打也不肯说出来的话”。猎人从霍尔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纯朴而聪明的语言，他的见识是非常广博的。霍尔的谈话表现了俄罗斯人确信自己的力量，连毁灭自己也不顾惜——他很少留恋过去，而勇敢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

这里，屠格涅夫接触到俄国农奴制改革前那个时期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他以霍尔、卡里内奇等农民形象，表明残酷的农奴制的压迫，并没有摧毁俄国农民的乐观性格和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潜伏着反对农奴制、改造俄国的力量和智慧。这篇故事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猎人笔记》中，跟踪猎人的足迹，我们就可以看到众多的像霍尔、卡里内奇一样具有天赋智慧、多才多艺的善良的农民形象。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不是可数的一两个，而是千姿百态的一大群。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中的农民卡西央，也是一个富于理想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家眷，也无处定居的人。绰号叫“跳蚤”。他是大自然的宠儿。猎人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脸向着地，用上衣盖着头，躺在阳光下；除了享受大自然的温暖，他一无所有。这个羸弱、瘦小的老人，却有着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他谈起大自然是多么富有诗意：“我到库尔斯科去，有时到更远的地方。在沼地里和森林里过夜，在原野里我独自在荒僻的地方过夜。那里有鹈啼着，那里有兔子叫着，那里有野鸭鸣着……我晚上注意看、早上倾听着，黎明时候在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莺唱得很可怜，很美妙……”他与大自然的生物息息相通，赋予它们以感情，他将自己对命运的感触寄托在夜莺的歌声中。卡西央也会唱歌，他的音乐老师是林中的百鸟；卡西央模仿它们，同它们相呼应。卡西央用他独特的方式批判了俄罗斯的现实社会生活。同许多农民一样，他相信上帝，主张“依照上帝的命令而生活”，但与统治阶级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不一样，他是依照自己的愿望再造一个公正的上帝。当他与猎人第一次见面时，他批评猎人说：“你们一定是打天上的鸟……林中的野兽……你们杀上帝的鸟，流无辜的血，不是罪过？”他在血上大做文章，显然是对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卡西央有点像卡里内奇，特别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上。但他与卡里内奇不同的是他有理想，不满足于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他顽强地追求农民的理想境界和真理。他说：“库尔斯克的那边有草原，那样的草原，真是可惊，真是使人高兴，真是畅快，真是上帝的惠赐！据人们说，这些草原一直通到暖海，那里……一切人都满足地、正直地生活着……我就想到那边去……而且不但是我这个有罪的人……许多信徒都穿上草鞋走，一路乞食而走着，寻找真理……正是这样的！……住在家里做什么呢，喂？人间是没有正义的，正是这样的……。”他痛恨那没有正义的人间，他心里有一个“一切人都满足，正直地生活”的理想境界，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样”是他的口头禅。他决心穿着草鞋，乞食而行去寻找真理。在卡西央这个形象上面，体现出一种农民哲学家的朴素的、美好的精神境界。

《猎人笔记》中的不少篇章，描写了俄罗斯女农奴的生活和她们热爱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在《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中，描写了一个流浪的吉卜赛姑娘玛霞，有着专横的热情和无所顾忌的勇敢。她不愿在贵族之

家享受同夫人一样的一切尊荣，竟果敢地舍弃了且尔托泼哈诺夫老爷。屠格涅夫生动地描写了玛霞与老爷话别的精彩一幕。这个吉卜赛姑娘经过顽强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心奔向自由的天地。她拎着一个包裹，断然从贵族之家逃出；且尔托泼哈诺夫手里拿着手枪追上了她。两个人像两团烈火相碰，溅起了冒着火星的对话：“你并没有得罪我，邦捷列·叶烈美奇，只是我住在你家里，觉得不耐烦了……我感谢你过去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再留下了——决不能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住到现在，一向只知道安乐和幸福——突然就不不耐烦了！就要抛弃我了！包上头巾管自走了。你享受一切尊荣不亚于夫人呢……”

“这些我一点也不在乎。”玛霞打断了他的话。

“一点也不在乎！”，可见玛霞没有在享受中磨掉自己的“狼”性。因而，她能对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手枪不动声色；对且尔托泼哈诺夫的金钱，不屑一顾；对且尔托泼哈诺夫的哀求，付之一笑，而唱着“青春时代甜蜜的日子”，坚定地迈向新生活。她向且尔托泼哈诺夫说：“……我们的性格和习惯本来就是这样的。倘使‘厌烦’这个离间者一来到，灵魂就被召唤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自由，玛霞告别了过去，勇敢地迎接未来。

《活尸首》中的农奴女露克丽亚，原来是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姑娘，后来生病，变成了木乃伊式的病人，她一个人孤独地躺在一所破屋里。但她从不诉苦，也不叹息，她能够在大自然中寻求乐趣。当猎人同她告别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却念念不忘农民的生活，“有的人比我还苦呢”，“有的人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她对猎人说，“请您好好劝劝您的老太太——这里的农人都很穷，请她略微减一点租税也好！他们的地不够，没有利益……我可什么都不需要，一切都满足了。”露克丽亚形象，不仅反映了农奴的高尚情操，也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白静草原》则为我们刻画了一群天之骄子——农奴的后代。一群天真烂漫的牧童，在夏夜的白静草原的篝火前讲述着充满幻想色彩的鬼怪故事。他们讲着讲着，后来竟被自己的故事吓得面面相觑，发抖了。有个小勇士巴夫路霞批驳了他们，“哈哈，你们这些笨家伙”，他叫喊，“怕什么呢？看呀，马铃薯煮熟了。”正当他们在讲一个可怕的故事时，两只狗同时站起来，痉挛地吠着，从火边抢出，消失在黑暗中了，它们仿佛也受到可怕的故事的感染，恐怖起来，使得孩子们都害怕起来。只有巴夫路霞一人跟着狗前去。当他骑马归来时，镇静地回答了伙伴们的问话，“没有什么”他这样回答，然后淡淡地补充一句：“大概是狗嗅到什么，我想是狼吧。”作者热情地赞美这勇敢的孩子：“他那不漂亮的脸由于快跑而充满生气，流露着刚勇的果敢和坚毅的决心。他手里没有棒，在深夜里，能毫不踌躇地独自去追狼……”多么可爱的大有希望的一代，既然从小不怕豺狼，长大难道还会怕什么人间豺狼么？

从上述几篇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屠格涅夫笔下的农奴，无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都不满意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而向往着自由美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霍尔曾说出了“在别人是挨了拷打也不肯说的话”。作者为避免检查，并没有把霍尔的话明白地传达给读者。但作者在《孤狼》中巧妙地透露了他的意见。

猎人与“孤狼”是在雷雨中相逢的。“忽然电光一闪，我瞥见路上有一

个高大的人体。我就向这方向仔细注视——仿佛是从我马车旁边的地上升起来的。这就是守林人孤狼，他的正名叫福马”。奥辽尔省的人称孤独而阴气的人为孤狼。他的妻子跟过路的商人逃跑了，他守着两个小孩在树林深处过着孤独的生活。据农人们说，他是世界上最尽职的人：一束枯枝都不让人家拿走。如果拿了他的，无论是什么时候，即使是半夜，他也会来袭击你，像雪落在头上一样。而你休想抵抗，因为他力气大，像恶魔一般敏捷……而且没有办法收服他：请他喝酒，送他钱，都没有用；无论怎样诱惑他都不行。有些人不止一次想弄死他，但是不行——办不到。然而，这个孤狼却有他独特的哲学。由于他处世孤独，不仅地主，即使是农人也没看出隐藏在他思想深处的新颖哲学，屠格涅夫却用孤狼的行动，深刻地把它展示在我们眼前。

一个农人在阴云密布的夜里盗伐树木，被孤狼捉住了。孤狼对这个“盗贼”的处理别具一格。开始，这被捕的农人苦苦哀求释放：“放了我吧……我只是为了肚子饿……我们穷死了，真的……放了我吧！”孤狼对此置之不理，把头靠在桌子上，竟打起呵欠来了。也许你会为这种冷酷感到惊讶。可是后来那农人转哀为怒，突然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满脸通红了。“哼，好！你吃我吧！好！你吞了我吧！……你杀吧——一样是完结；饿死，这样死——都是一样的。杀光吧！连老婆、连孩子……可是你等着吧，会跟你算账的！”这时，守林人站起来上前抓住了他的肩膀，猎人以为他要严惩那动怒的农人，于是上前去帮助那被捕的农人，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景：被捕的农人在绝望中发出震怒的叫喊，“你这凶手，畜生，你难道不会死的……等着吧！”孤狼对这叫喊的答复是，一下就把捆绑的带子从农人的肘上抽去，抓住他的衣领，把他的帽子拉到眼睛上，开开门，把他推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恶魔”般的孤狼也欺软怕硬？不会的。孤狼另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只会求饶的人，不值得理睬。当初他喊这农人为“笨家伙”，就含有极度的轻蔑之意，认为他是连贼都不会做的。当农夫突然站起来，向逼得他走投无路的人展开了挑战，在绝望中喊出惊天动地的预言，宣判恶势力的死刑；这种宣判，使得孤狼认清对方不是一个“笨家伙”，而是一个有血性、有胆量的觉醒者。这种宣判正合孤狼的心理，虽然农人误解了他，但孤狼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农奴主的忠实奴才，于是孤狼毅然释放了他。

《孤狼》展示了一个可贵的政治倾向：鼓励农奴的反抗行为。这种倾向，在其他篇章中也有所反映，如《莓泉》，描写农民符拉斯冒险步行到莫斯科，请求地主老爷减租或改成劳役租制。屠格涅夫在未发表的《食地兽》中，构思了农民最尖锐的反抗形式。他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在这个短篇里，我要描写一件在我们这里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农民是怎样弄死了一个年年夺取他们土地的地主，因而农民把他叫作‘食地兽’，他们强迫他吃下八普特最肥沃的黑土，看吧，情节是可笑的。”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些农民的反抗形式，只是请愿或个别报复。这是作者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映。尽管如此，《猎人笔记》总的倾向是主张以实际行动来改造俄国农奴制。《猎人笔记》以蕴含着深意的风景描写（《树林和草原》）作为结尾，鲜明地反映了作者对俄罗斯光明前途的展望。

《猎人笔记》描写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地主。《两地主》中的地主斯捷古诺夫是“照老例行事”的人，他的哲学是“主人总是主人，农人总是农人”，“如果父亲是贼，那么儿子也是贼”。鞭打农人，是这位地主的最大享乐。

一次，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跑到他家花园里，叶尔米尔的女儿娜培尔卡——一个年约十一岁的女孩子，手里拿着枯枝，从街上跳进花园的篱笆赶它们回去。鸡进了主人的花园，就归主人所有，你还想赶回去，真是岂有此理。斯捷古诺夫在阳台上狂热地叫喊：“捉住，捉住！”（作家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连用了六个“捉住”）他又叫喊：“喂，尤希卡，放脱了鸡，给我把娜培尔卡捉来。”年已七、八十岁的老仆人尤希卡，还没有跑近那惊恐的女孩子，不知从哪里出现了女管家，在她的脊背上打了好几下。

“正要这样，正要这样，”地主接着说，“啧啧，啧啧，啧啧，啧啧！……”他又大声地说：“把鸡拿去，阿富多佳。”然后满面光辉地对猎人说：“先生，这狩猎如何，喂？我汗都出来了，你看。”

让我们再看看猎人记述的下面这一“精采”的场面：

……四周完全肃静了。只有风偶尔一阵阵地吹来，……从马厩那里发出一种均匀而频频的敲打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倾听了一下，点点头，喝了茶，然后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带着最亲切的微笑，仿佛不知不觉地合着那敲打声念着：“邱基！邱基！邱基！邱基！邱基！”

“这是什么？”我惊奇地问。

“那边，照我的命令，正在惩办一个顽皮的家伙……”

原来这位地主老爷是在入神地欣赏自己亲自导演的“鞭挞曲”，这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这“美妙的乐曲”正是农奴主残酷压迫农奴的血泪记录。

描写地主形象最出色的一篇作品还应数《村吏》。作品写一个青年地主宾诺奇金，他是退職警卫军官，全省最有教养的贵族和最可羡慕的风流男子中的一个；女人们为他发狂，极口称赞他的风采。他宣布自己是伊壁鸠鲁的信徒，喜欢音乐，用柔和而动听的嗓音讲话。总之，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地主，他似乎不像斯捷古诺夫那么凶残。但作者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宾诺奇金“仁慈”外衣掩盖下的残酷本性，使他成为一个概括性最强的成功典型。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吃饱了早点，样子显然很满足，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把酒杯放到嘴唇边，忽然皱起眉头。

“葡萄酒为什么不烫热？”他用十分刺耳的声音问仆役中的一个。

那个仆役着慌了，像钉住一般站着，脸色发白了。

“仁兄，我不是在问你吗？”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冷静地继续说，眼睛一直盯着他。这个不幸的仆役踌躇不前地站着，弄着餐巾，一句话也不说。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低下头，沉思地蹙着眉头对他看。然后扬起眉毛，按一下呼铃。

一个肥胖的、脸色浅色的、黑发、额角低而眼睛肿的仆人走进来了。

“费多尔的事……照办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十分沉着地低声说。

“照办吧”，这是多么富有个性的语言，照办即照老例办，由此可见他对农奴的一贯手段。

列宁不止一次提到这个情节。他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也是‘人道’的人，例如，他是那样的人道，竟不愿亲自到马厩去看看……鞭挞费多尔的鞭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他不声不响，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真是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

这个“人道”的地主，有一次偶尔高兴，要陪猎人到略波伏去打猎。他

们带有在某些俭朴自持的德国人足够一年之用的物资出猎。在一座刚才修好的小桥上，载厨子的马车翻倒了，后轮子压着他的胃。宾诺奇金这一吓非同小可，连忙叫人去问他：手有没有跌伤？得到了满意的回音，立刻放心了。乍一看，他竟为厨子翻车吓得非同小可，并亲自派人去询问伤情，何等“人道”；然而他关心的是厨子的手伤了没有，因为这手是直接为他服务的。当他知道车轮只是压了厨子的胃，并未伤手，便泰然放心了——这是何等冷酷的心呵！

这位青年领主因为歇宿而来到了他的领地希比洛夫卡，屠格涅夫精彩地描写了他的来到所引起的骚动：

……我们的马车在村子里走。有几个坐在空马车里的农人碰到了我们，他们是从打谷场来的，正在唱歌，全身颤动着，两脚在空中摇摆，这是何等欢乐自在的景象；但是一看见我们的四轮马车和村长，突然静默了，脱下他们的冬帽（这时候是夏天），站起身来，仿佛在听候命令。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亲切地对他们点头。主人的“亲切点头”，却像晴空霹雳震撼着整个领地，惊慌的骚扰显然扩展在村中了。穿格子纹裙子的农妇用木片投掷那些感觉迟钝的或者过分热心的狗；一个胡须从眼睛底下生起的跛足老人，把一匹还没有喝饱水的马从井上拉开，不知为什么在它肚子上打了一下，然后鞠躬行礼。穿长衫的小孩啼哭着跑向屋里去，不再从那里出现了。连母鸡也急急忙忙地快步走向大门底下的缝隙那里去；只有一只黑胸脯像缎子背心而红尾巴碰到鸡冠的大胆的雄鸡，停留在路上，已经完全准备啼叫了，忽然困窘起来，也逃走了。

领主的到来，使欢乐的歌声窒息了，连鸡犬都不得安宁。只须从这个场面，就可以看出“仁慈”的地主宾诺奇金会给他的领地带来什么样的“幸福”，只须看这幅画面，也就可以知道农奴制给俄罗斯大地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在《小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叙述了一个横暴的、贪得无厌的大地主——他就是屠格涅夫的祖父。他骑着马出去，用手指着说“这是我的领土”，这块地就归他所有了。凭一个手势，就能占有土地，何等横暴。小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个大地主一次侵占了小地主家的土地，小地主的父亲要去法庭告状，却被他派猎师带人打得死去活来，直到答应土地归他才罢休。这个大地主并将这地取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棒地”，因为是用棒子夺来的。夺小地主的土地，只需要手势加棍棒；夺农民的财产，就更不在话下了。

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不只贪得无厌、疯狂鲸吞农民和他本阶级中弱者的财富，而且一个个从里到外都散发着腐朽味。《莓泉》中的伯爵彼得·伊里奇是一个显贵，彼得堡的第一流人物常常来拜访他。他开起宴会来，真了不得，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竟放火炮。单是乐队，就有四十人，用一个德国人当指挥。如果说这个私人宴会阔气得惊人，那么，这位伯爵的行猎却“壮观”得可笑。他行猎的原则是一切都要漂亮，马要漂亮，看狗的人也要漂亮。穿着有绶带的红外套的看狗人集中在院子里，吹起号角，大人出来了，他们就把马牵给大人，大人上了马，猎师的头目把大人的脚放进马镫里，脱下帽来，把马缰绳放在帽子里卷上去。大人抽起鞭来，看狗人齐声吆喝，走出院子去，马夫跟在伯爵后面，用丝绸带子牵着主人的两条宠狗，照料着……当然还有许多客人。又是娱乐，又有“礼仪”。

行猎是被伯爵“礼仪”化了的寻欢作乐，而物色女人则是他抛弃一切礼仪的另一种“行猎”。他不顾一切地从“下层阶级”里去挑选姨太太。对“宠

狗”，他不惜用丝绸带牵着；对宠妾，就恨不得“把全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给她们”，为了满足卑劣的兽性，不惜倾家荡产。

这个腐朽透顶的贵族，可以为一只心爱的猎犬奏乐送葬，并立一块有铭文的石碑；对农民却决无丝毫的仁慈。正如小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说的：“地主拿农民当作木偶，把他们摆弄来摆弄去，把他们弄坏了，然后扔掉。”

地主不仅从经济上、政治上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且在婚姻问题上野蛮地迫害他们。《叶甫莫莱和磨坊主妇》里面的女农奴阿丽娜，服侍女地主慈费尔科夫太太整整十年了。一天她突然请求出嫁。这本是人之常情，却被地主认为是“忘恩负义”的行为，遭到无理拒绝。半年之后，阿丽娜终于与奴仆彼得路希卡之间发生了地主认为说出来也难为情的事。于是被地主视为“腐朽分子”而吩咐把她的头发剃掉，给她穿上粗布衣服，送到乡下去，遭到流放的命运。

其实，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也不一律是被谴责的对象，他也写了些不失为俄罗斯人的地主。《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也夫》中的主人公能逾越阶级的界限，真挚地爱上了别人家的农奴姑娘。地主且尔托泼哈诺夫，被作者用了两个较长篇幅来刻画。他性格骄傲，宁折不弯，并富有正义感，敢于顶撞权贵，保护弱者。这些形象表明农奴制腐朽到违背俄罗斯民族性的地步。作者打击的不是整个贵族阶级，而是其中的农奴制的拥护者。然而，屠格涅夫又给他的“好地主”一律安排了悲剧的结局，表明他已看出，几个好地主改变不了俄罗斯社会的命运。由于阶级的局限，屠格涅夫终究不能正确揭示“好地主”失败的社会根源，而只是归结于某些个人的、偶然的原因，这就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猎人笔记》出版以后，俄国教育大臣曾于一八五二年八月十二日向尼古拉一世呈上一份特别报告书，他说屠格涅夫这部作品中“绝大部分文章带有消灭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而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由于他的呈请，沙皇解除了里沃夫公爵图书审查官的职务，因为他的愚拙，才使屠格涅夫的这部作品发行了。可见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形象，已使沙俄统治阶级恼羞成怒了。

《猎人笔记》不愧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它问世之后，就受到俄国文艺界广泛的注意。别林斯基正确地论述了《猎人笔记》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他说，屠格涅夫的才能最显著的特色在于：他的创作永远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之上。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以极端朴素的白描手法，潇洒自如的“随记”形式，以猎人的行踪为线索，叙述了俄罗斯农村那些最平常的生活故事，勾勒出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画面；他处处让生活本身说话，让读者从那些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中，去领略生活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深刻的思想意义。《猎人笔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一篇篇作品都统一在揭露农奴制下农民与地主尖锐对立的关系和反对农奴制这一深刻主题之下，使得各个短篇结集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基石，也是他那些成功的长篇小说出现的先兆。它的思想内容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的艺术成就和创作方法，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前夜》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于一八五九年六——八月。它是作者创作的黄金时代——第三创作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屠格涅夫整个创作史上

的杰作之一。

这部小说为什么题名为《前夜》呢？

因为它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俄国姑娘叶琳娜，为着共同的理想，与留学莫斯科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志士英沙洛夫相爱。由于斗争的需要，英沙洛夫必须离开俄国，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叶琳娜毅然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挠，决定与丈夫一起奔赴前线。但就在他们即将到达保加利亚的前夜，积劳成疾的英沙洛夫与世长辞了。这是多么不幸啊！但叶琳娜没有因为丈夫去世而放弃她的理想，她继承英沙洛夫的遗志，背井离乡，带着英雄的遗体奔赴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作品主要写叶琳娜这个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夜”的成长过程。她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作品以她的性格发展为线索，脉络清晰地展开故事情节。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日子里，在离昆错沃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株高

大的菩提树树荫下，有两个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那年纪大点，却像孩子似的优美动人的，是舒宾，一个浪漫主义的雕塑家；那年轻点，反而像老头般呆板笨拙的，是伯尔森涅夫，刚以第三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

这对青年，在海阔天空地议论着艺术、人生、爱情。我们从他们漫无边际的谈话中可以听到一些即将出场的主人公的信息。哲学家说他的同学英沙洛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至于到底如何了不起，他也说不清，只说：“你将来会看见的。”至于叶琳娜，舒宾则从雕塑家的角度发了一通怪论。伯尔森涅夫问叶琳娜的胸像雕塑得可有进展，舒宾说：“没有，我的老兄，搞不下去啦。就是那脸庞儿，也够叫我没有一点办法。……就像神话里的珠宝，可望而不可即。一个雕塑家，尤其像我这么个低能的雕塑家，对于那样的脸能怎么办呢？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一个是“了不起”的人；一个是“不可思议的人”。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作品一开始，你就不得不思索这个问题。屠格涅夫不愧为制造“悬念”的能手，主人公未登场，就给读者形成了强烈的印象。

叶琳娜是从哪儿得来那么美丽的灵魂呢？是哪一个点燃了她那心灵的火把呢？舒宾这样向哲学家提问。因为在他看来，她的家庭与她是那么不相称，父母是那么平庸，而她竟是他们的女儿。

叶琳娜生长在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父亲斯塔霍夫是一个退役军人，曾是上流社会最风流的美男子。他为了发一笔妻财而娶了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她虽然七岁上成了孤儿，却继承了相当大的家产）。叶琳娜的出生，损害了母亲的健康，父亲却因此而远离家乡，沉溺在同孀妇奥古斯丁·克利斯询诺夫娜鬼混的糜烂生活里，不问家事。母亲安娜是一个温柔的、软弱的人，丈夫的不忠，使她深深伤心，但她从不当面责难他。可是私下里却轮流向家里的每一个人，甚至向自己的女儿，埋怨他。她整天无所事事，沉浸在感伤和忧郁里。她不爱出门，却高兴有客人来陪她；当她独自一个的时候，马上就会病倒。

父母的平庸，家庭的平庸，反使她优美的天性，在萌芽时期没有受到摧残。父母思想空虚，使她毫无依赖地发挥自己独立的思考；她的思想水准像春潮一样急骤上涨，迅速地跨过了父母智力的水平线。最初，她崇拜父亲；其后，热烈地依恋母亲；而最后，则对于父母都变冷淡了，尤其对于父亲。

愚昧令她愤怒，软弱使她反感。

家庭的一切，成为她认识人生的教科书；环境使她早熟。人生对于她，绝不同于儿戏。饱经风霜的家庭女教师，培养了她读书的兴趣。可是，叶琳娜有别于其他小孩，仅仅读书，不能满足她。从儿时起，她就渴慕着行动和积极的善行。她深切同情别人的痛苦。对于贫困的、饥饿的、病弱的人们，她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甚至将她这种爱延伸到自然界。所有被虐待的动物，从巢里掉下来的小麻雀以至小虫，全可以从叶琳娜得到保护：她亲自饲养它们，一点也不嫌弃。她十岁那年，曾与女乞丐卡嘉相识，并发生了传奇性的故事。她常常带着糖果等东西，到茂密的灌木丛中去会卡嘉，风雨无阻。她以一种喜悦的、虔诚的感动啃卡嘉的陈面包，听她讲故事，学唱粗野的小调；以那隐秘的崇敬和惊愕，倾听卡嘉发誓，要离开那整天虐待她的可恶的婶母，逃到“完全听凭上帝的意旨生活”的地方去。这是在她家那平庸世界里，从来听不到的神圣语言。这自由的呼唤，使得叶琳娜梦想着怎样拄着手杖、背着口袋、顶着花冠，同卡嘉逃跑，流浪在村野……。可是不久，卡嘉死去了。但她在叶琳娜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卡嘉的召唤，不断地在她耳边回响。应该说，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正是叶琳娜后来勇敢地抛弃家庭，远离故土，同英沙洛夫一起奔赴战斗前线的先声。

犹如冰层下的流水，叶琳娜外表很文静，内心却激荡着对理想的不息追求。从十六岁起，她就几乎绝对独立地生活。环境使她感到寂寞，她好像笼中的鸟儿似的苦斗着，而笼却又无影无形。没有人压迫她，也没有人拘束她，可是，在内心，她却感到烦恼和苦闷。一种无名的、不可控制的力，在她心底沸腾起来，大家要求着自己的出路。总之，她是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夜的沉闷空气里，艰苦地期待着、追求着。然而，她的社会环境，目前还没有教会她单独去干点什么大事业。一阵感情的风暴过去，疲乏的翅膀，在飞升之前，又低垂了。她必须追求一个能带领她展翅飞向理想境界的人。十七、八岁时，一个思想在她的胸中升腾起来：“没有爱，怎么能生活呢？可是，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爱！”有时她感到，她所要求的，也许在整个俄国就不会有一个人要求，不会有一个梦想到。

小说开端的一八五三年夏天，叶琳娜刚满二十岁，她正怀着这种崇高的理想和严格的要求，寻求自己的同志和引路人。

最早闯入叶琳娜生活的，是艺术家舒宾。舒宾是她母亲远房的内侄，父母去世后，他就寄居在叶琳娜家，十九岁那年进了大学医科。但他从小就表现了对雕塑的兴趣，只上了一年大学，便中途退学，专一从事艺术事业。舒宾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狂热地爱着叶琳娜，但他并不理解她。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叶琳娜与他之间的冲突，那是在别墅里用完午餐之后。叶琳娜陪着舒宾和伯尔森涅夫到花园里去，在一座刺槐树亭子里，舒宾漫不经心地塑着叶琳娜的女友卓娅的肖像，而叶琳娜与伯尔森涅夫在津津乐道地谈着哲学问题。伯尔森涅夫谈了他父亲的哲学著作、谢林的学说和自己要献身于哲学研究的志愿。这些话题，引起了艺术家舒宾的不满，大叫着：“我的天，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树下，怎么还有心谈哲学哟？不如谈谈夜莺、谈谈玫瑰、谈谈美丽的眼睛和青春的笑颜吧。”

“嗯，还有法国小说，和女人的打扮。”叶琳娜深知艺术家的兴趣，于是，这样接了下去。

“那可不行，”舒宾回答说，“要是打扮得漂亮，有什么不可以谈？”

“那可不行！可是，万一别人不高兴谈女人的打扮呢？您一向自命为自由的艺术家，那么，为什么要妨碍别人的自由呢？……”

这说明舒宾是多么不了解叶琳娜，一向善于言谈，巧于辩论的艺术家，被这不可思议的姑娘弄得张口结舌了。他气急败坏地挥拳砸掉了手里的塑像，跑回了房间。叶琳娜却挽着伯尔森涅夫的手臂，走出花园，继续谈着哲学。

这次纠纷在三个青年心胸里都激起了波澜。当夜，舒宾带着闪烁的泪珠进了酒店；伯尔森涅夫神情恍惚地抚着钢琴，眼里也不只一次充满了眼泪；而叶琳娜这坚毅的姑娘，也时而把冰冷的手臂伸向低沉的夜空，时而跪在床边，把脸偎在枕上，无论如何抑制，那不可思议的燃烧似的热泪，却不由自主地从她的眼里流出来。

舒宾直率地道出了这纠纷的结果，他对哲学家说：“上帝见证，我爱着叶琳娜，叶琳娜却爱你。”

正如舒宾说的，叶琳娜也喜欢过他，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叶琳娜深刻地看到，舒宾虽不满于现状，却没有勇气去追求，只是用玩世不恭来发泄满腔的忧愤；他虽然狂热地爱慕叶琳娜，却抑制不住一时的冲动，轻浮地去吻叶琳娜的女友卓娅的手膀……总之，他虽有热情而缺乏坚定的信仰，看不见自己的前途，更谈不上将叶琳娜带向蓬勃的活动。那次冲突之后，舒宾曾向她表示忏悔，想挽回残局，可是叶琳娜说：“照我看，甚至您的忏悔，也只是您自己跟自己闹着玩儿的，还有您的眼泪，也是。”

多么严酷的判决，它使舒宾战栗了。

伯尔森涅夫是一个诚挚而专注的哲学家。叶琳娜想在他的哲学王国里，找到怎么生活的答案。于是一种温柔、善良的感情，在她心底萌芽。

大概是因为多次地讲那些枯燥的哲学，似乎有点使叶琳娜感到乏味，于是伯尔森涅夫谈起了他同学中一个非凡的人物——英沙洛夫。他的身世和品格深深地感动了叶琳娜。

英沙洛夫是保加利亚一个富商的儿子，在一八三三年（故事发生前十八年），一桩可怕的灾祸降临了：英沙洛夫的母亲失踪了！一个星期以后，发现她被人杀死。据传，她是被土耳其侵略军的一个高级军官糟塌了，杀掉了。父亲查出了实情，用匕首刺伤了那个军官，他自己也被侵略军枪毙了。当时英沙洛夫才八岁，被邻居收留，后来在基辅的姑母家寄居了十二年。一八四八年初，刚满二十岁的英沙洛夫，深怀着国耻家仇回到祖国，用两年时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考察了自己的祖国。土耳其政府残酷地迫害这颗复仇的种子，一八五〇年，他颈上带着一条很宽的伤疤到了俄国，进莫斯科大学学习。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解放祖国这个轴心旋转。

英沙洛夫的不平凡的身世，使叶琳娜深受感动。许久许久，叶琳娜没有把视线从伯尔森涅夫身上移开。叶琳娜或许还从没有这样注视过伯尔森涅夫；此刻虽然她的视线没有从哲学家身上移开，而她的注意力却已渐渐转移到那未出场的保加利亚志士身上了。她仔细地打听他的性格、为人，包括每个细节，例如她问：“他对人也不羞怯么？”

“不，他对人一点儿也不羞怯。只有那种自负的人，才会对人羞怯。”

“那么，您也是那种自负的人么？”

伯尔森涅夫变得迷乱了，只摆了摆手。因为他实在无法回答叶琳娜深入的盘问。

这次对话，使叶琳娜变得沉思起来。

“解放自己的祖国！”她说道：“啊，多么伟大，说起来就多么叫人战栗的话啊！……”从来说话叫别人战栗的人，现在因别人的话而战栗了。因为在她身边的青年（包括伯尔森涅夫在内）中从未发现过的闪光思想，而今像启明星一样悬挂在她眼前了，她感到十分惊喜，迫不及待地问伯尔森涅夫：“他肯来看我们吗？”

英沙洛夫在叶琳娜思想上引起的强烈反应，简直使伯尔森涅夫感到不安，他预感到一种忧愁，尽管这样的忧愁不能认为是高尚的。

两天以后，英沙洛夫果然从莫斯科来到昆错沃。他是受伯尔森涅夫的邀请，到这里来度假期的。

初次见面，他在叶琳娜心里并没有产生像她所期待的那么强烈的印象，舒宾甚至断言他是一个枯燥的人，虽然全心全意献身祖国，“却不讨女人的欢喜”。但实际上，英沙洛夫次数不多的访问，却一次比一次对她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她渴望有机会和他单独会晤，谈个痛快——要和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友谊，至少一次单独晤谈总是必要的——哲学家看出来，她的心事被英沙洛夫触动了。

一天，伯尔森涅夫突然告诉她：英沙洛夫失踪了。这使叶琳娜大吃一惊，她“沉”到一把椅子上，却又极力装作冷淡地说“大概是到莫斯科去了吧”，来掩盖自己不安的神情。至于为什么要装作冷淡，连她自己也不禁感到奇怪。

英沙洛夫回来后，他们再见面时，这个聪明而勤于思索的姑娘，当她知道英沙洛夫是为了他们爱

59 国集团内部的一点争端，而跑了几十里路，耽误了三天时间时，觉得不值得。但英沙洛夫说，自己属于所有需要我们的人，推辞为他们办事，就是罪恶。当她关切地询问那杀亲仇敌的下场时，得到的回答是，现在不是报私仇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公仇。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不正是叶琳娜多年寻找的理想答案吗！他们谈得那么坦率、真挚。从那天起，他们交往更密，而伯尔森涅夫则一天比一天拜访得更疏了。在两个朋友之间，一种奇妙的感情开始产生出来，但谁都不敢有所解释。这就是说，他们都感觉到，叶琳娜爱情的风帆，已明显地由伯尔森涅夫转向英沙洛夫了。

不久，几个青年朋友在游察里津诺时，他们被一批流氓成性的德国军官包围了，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只有英沙洛夫像勇士一般站起来，将为首作歹的德国人，举起来抛进了湖里，这才解围。她为他的壮举感到恐惧，但更坚信，他不仅是说得出，而且做得到——这正是俄国青年所缺乏的。郊游之后，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篇幅的“日记”，来披露叶琳娜的心理活动。她在严格地淘洗自己的情感，周密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她在将英沙洛夫同俄国青年进行严格的比较：

“舒宾漂亮像一只蝴蝶，并且夸耀着自己的漂亮，这是连蝴蝶也不做的……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许比他更有学问，也许甚至更多智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和他比较起来，却显得那么渺小了……

“当他一说到自己的祖国，他好像就长大了，长高了，他的姿容就立刻焕发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纯钢了，啊，不，好像是，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低下头去。他也不只是空谈——他行动，还会永远行动下去。

……”

她这样深刻而准确地掌握了英沙洛夫，于是在“日记”的最后，写下这样的结语：

“我爱他！”

也就是说，她终于找到了同志和引路人，决心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托付于他，尽管他不是俄国人。然而，正当叶琳娜在日记里写上这最后的、决定性的话语的时候，英沙洛夫正坐在伯尔森涅夫的房里，伯尔森涅夫站在他面前，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英沙洛夫刚宣布要在第二天回莫斯科去。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没有觉察到叶琳娜的爱情？不，他觉察到了，并爱她。但他不愿意为了个人情感的满足而不忠于自己的事业和义务。叶琳娜从伯尔森涅夫的解释中，知道英沙洛夫之所以要离去，是出于对她的爱。

“他爱我！——这思想忽然闪光似地掠过她的全身，她惊恐、羞怯，从而对英沙洛夫也更神往。

她相信英沙洛夫会来告别的。从早晨起，她就沉浸在神圣的幸福的渴望之中，但时钟敲了十一点、敲了一点……还不见他的踪影。“他不辞而别了？”这思想，随着血液冲上她的脑里来；她被不可言状的悲痛压倒在床上，把脸藏在双手里，而眼泪又不由自主地从指缝里淌到枕上。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一种奇特的思想在她心里升起：她的面容变了，眼泪干了，眉头蹙了，嘴唇也咬得更紧——可以看出，她经历了多么严重的思想搏斗，下了何等的决心——她站起来，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溜出了屋子，沿着通向英沙洛夫住所的道路，快步走去。

她毫无顾忌地、坚毅地向前走着，没有注意太阳早隐入黑云，风在树间怒吼，扯乱了她的衣衫，尘土在路上飞旋滚动，大滴的雨点劈头盖脸落下；雷电终于惊醒了她，她停步环顾四周……幸而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教堂。叶琳娜奔向教堂，躲在矮檐下。大雨倾泻着，整个天宇完全晦暗。叶琳娜以无言的绝望，凝视着那急雨的密网，和英沙洛夫再见一面的最后希望，被急雨冲洗掉了。

这时，作者忙里偷闲地写到，叶琳娜在绝望中，在风雨教堂前遇到一个老乞妇；不巧她没带钱，于是她把自己的一块小手帕给了这乞妇。饱经风霜的老乞妇，看出了这位小姐的忧伤，她深情地说：“我就把您的苦恼跟您这小手帕儿一齐带走吧，好吗？我把它带走，也就完啦。”这段插曲，犹如音乐中优美抒情的过门，使文章变化有致、似断而续、逸趣横生。

乞妇缓缓走出了教堂。雨渐渐稀了，停了，太阳也从云端里显露出来。叶琳娜正要离开教堂，忽然，在离教堂十来步远的地方，她看见了英沙洛夫。他裹着一件外衣，正在叶琳娜走过来的路上走着……

她不能支持了，用手抓住台阶上腐朽的栏杆。她要呼唤他，可是，叫不出声来。作者善意地将这对情人的相会，安排在雨过天晴的美好时刻，但他们思想上的急风暴雨却未停息。英沙洛夫一方面受着爱情的折磨，一方面受着理智的制约：他竟违心地不承认叶琳娜是他朋友；连手也不伸向她，就要冷酷地告别。叶琳娜声音颤抖地喊住了英沙洛夫，问他：“您怎么会在这儿碰见我？您可知道我要上哪儿去？”

英沙洛夫愕然注视着叶琳娜。

“我要上您那儿去。”

“上我那儿去？”

叶琳娜掩住了自己的脸。

“您是要逼着我说，我爱您，”她低语着。

“现在……我说出来啦。”

“叶琳娜！”英沙洛夫喊道。

一对心照不宣的情人，终于对面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两股感情的激流，冲决一切堤防，汹涌汇合了，……叶琳娜垂下手来，望了他一眼，就投入了他的怀抱；英沙洛夫坚强的灵魂，被一种不可言说的柔情辗成了粉末，他从来还不曾体验过的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滚动着……

当他终于知道，叶琳娜决心离家弃亲，同他一起献身那艰苦的事业时，他发现爱情和信仰在这里获得了统一，他发现扑向自己怀抱的，不仅是爱人，更是战友，是何等欢欣。他火热地吻着她，温柔地托起她的头来，“那么，欢迎呀，”像呼唤一个入伍的战士，他对她说，“我的妻，在人们和上帝面前！”

风雨教堂相会之后，英沙洛夫还是回莫斯科去了；他走后，叶琳娜觉得眼前的一切都遥远了，一切都迷失在雾里，一切都不存在了。分别不久，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叶琳娜的父亲，忽然感到要关心女儿的婚事了。他认为到了她这样的年纪，也该抛开那些什么艺术家呀、学者呀，以及黑山人（即指英沙洛夫）之流，像别人一样生活才是。他这“别人”就是指一般的贵族妇女。他依照自己的理想，为女儿带来一个三十三岁的枢密院主任秘书——库尔拿托夫斯基，他“精明强干”，身兼两县要职。他认定这个能靠自己的薪金过活的六品官是理想的女婿。殊不知女儿这时已有了相当长的恋爱史，她的目光远远超过了平庸的父亲。主任秘书来的第二天，叶琳娜写信给英沙洛夫，细致地描写了他，并准确地断定这个“风度甚佳”的官场红人，不过是未来的专制魔王。这样一个贵族青年只能成为官僚阔少的同僚，而不可能成为叶琳娜的同志。

另一件，则是决定着叶琳娜命运的大事。英沙洛夫接受了祖国的召唤，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回国。叶琳娜决定与他一起回国。不幸的是，他为了替叶琳娜弄到一张护照，坐着一辆很糟的马车，颠簸着去求人，归途遭了暴雨淋，再加上出发之前的种种准备，疲劳过度，而突然病倒了。整整八天，伯尔森涅夫都热诚地照顾英沙洛夫，将他从死亡线上拖回来，并且还忠实地向叶琳娜传递信息。整整八天，叶琳娜在希望与绝望的界点上挣扎。直到第九天，英沙洛夫才摆脱危机。这天，伯尔森涅夫刚刚欢欢喜喜地告诉叶琳娜，医生已许可英沙洛夫吃一片牛肉，不久就可以出外行走了。这时她却变得沉思起来，垂下了她的眼睛，她终于对伯尔森涅夫说：

“我要求您……请别恼我，安得烈·彼得罗继奇……我要求您：明天别上他那儿去！”

伯尔森涅夫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啊！对啦，我明白啦，很好，很好。”于是又添说了两个字之后就匆匆告辞了。

叶琳娜单独会见了病后的英沙洛夫，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爱情，那相会的激情，自然不低于风雨教堂的相会，英沙洛夫对情人说：“叶琳娜，怜悯我吧——去！我觉得我会死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激动。”

叶琳娜与英沙洛夫相爱，被她父亲知道了。于是，那本来不问家事的父亲，借机在家爆发了一场风暴，大抖其家长的威风。他将一切脏话，像暴风

雨般倾倒在女儿头上。叶琳娜理直气壮地宣布，他已同她丈夫英沙洛夫结婚，并在下星期就起身，去保加利亚。父亲扬言要上告，把那黑山人打入监狱，送叶琳娜进修道院。女儿的婚事，也是母亲意想不到的，她因此而病倒在床。但她毕竟是善良的母亲，不愿女儿当众出丑，于是她与丈夫谈判，答应替他偿还一切债务，并且当场交给他一千卢布现金，才算平息这场风波，使叶琳娜和英沙洛夫顺利地离开莫斯科。有趣的是，他们出发那天，一切就绪，他们坐上旅行雪橇要启程了。忽地，一乘驾着骏马的华丽的雪橇飞奔地来到了他们面前，从雪橇上跳下一个满身积雪的人，竟是她父亲；他斟了三杯酒，以父母的最后祝福，送走了这两个青年人。

在旅途中，英沙洛夫在维也纳差不多卧病两个月，到了三月末，才和妻子来到威尼斯。他希望从这里取道萨拉、经塞尔维亚、到保加利亚去；所有的道路都已断绝。多瑙河上战火正酣，英、法已对俄宣战，所有斯拉夫国家全部动起来了，准备起义。这之后，作品的情节急转直下。但作者似乎不忍心让他们匆匆地饮尽人生的苦酒，又给他们安排了威尼斯之行。这与风雨教堂、病后相会等场面一样，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作者以其诗意盎然的抒情笔触，描写了“美的城”威尼斯。他将威尼斯的风光，与主人公的情感融为一体。叶琳娜和英沙洛夫乘坐平底船在静静的大运河上游荡；他们约定，这一天不谈政治、战争，而尽情地享受威尼斯的自然美。他们欢乐地欣赏了美术馆的所有陈列品，观看了动人的歌剧《茶花女》……然而，他们的欢乐太短促，不幸接踵而来：漫游威尼斯之后，英沙洛夫又一次病倒了。

他高烧得人事不知，稍一清醒仍念念不忘祖国的船只。这满载祖国人民的希望和深情的船只终于到来了。但是，英沙洛夫却没有挣扎过灾难深重的一夜。

英沙洛夫在归国的前夜，与世长辞了。

叶琳娜，这刚获得新生的俄国姑娘，你何去何从？是重新回到平庸的家庭，还是继续前进？

叶琳娜在给母亲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坚定的回答：“现在，除了德米特里的祖国，我没有别的祖国了。……就是在德米特里死后，我也要忠于他的遗志，忠于他的终生事业……我为什么要回到俄国来呢？我在俄国能做什么事？”于是，她毅然带着英沙洛夫的遗骸，乘风破浪到保加利亚去了。

《前夜》正是通过对叶琳娜成长过程的描与，揭示了俄罗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在叶琳娜离开祖国时，舒宾说：“她丢在背后的尽是些什么人呢？她在这儿看见的尽是些什么人呢？库尔纳托夫斯基、伯尔森涅夫和不才我之辈：这还是一批最最优秀的呢，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舒宾说的几个青年，都有其典型性。库尔纳托夫斯基是个新式官僚；舒宾是个才华横溢，但无坚定信仰的艺术家；伯尔森涅夫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善良好学，英沙洛夫称赞他有“纯金般的心田”。但他的信条是甘居第二位，“让阳光去照耀别的人！我们的暗淡的生活也自有它的骄傲和自己的幸福呢！”他父亲的这些遗言，就是他生活的座右铭；他没有创造精神。这些俄国青年，都是些不能高飞的燕雀。作者借舒宾之口，叹息道：“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如果我们中间真有什么像样的人，那么，那个年轻的姑娘，那个敏感的灵魂，也就不至于把我们扔在脑后，不至于从我们这儿鱼一

样的溜到水里去了！”

叶琳娜寻找恋人，实则是在探讨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人。

《前夜》反映的是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夜”。改革有赖于“自觉的英雄”。屠格涅夫清醒地看到，在贵族中，即使是优秀分子，也不能肩负这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有“新人”。屠格涅夫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英沙洛夫和叶琳娜的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打开了崭新的一页。叶琳娜的形象比英沙洛夫更丰满；而英沙洛夫更带有理想色彩。叶琳娜是理想的追求者，英沙洛夫赋予她的理想以实际内容并引向实践。因而，只有英沙洛夫，才是当时俄国所需要的“自觉的英雄”。

作者通过书中人急切地呼唤着：“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来？在我们中间，什么时候才能有人呢？”他认为俄国的英沙洛夫出现之时，就临近俄国解放的“前夜”了；由于他同“现代人”集团一方面有联系，一方面又有分歧，并不完全认为他们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优秀分子就是英沙洛夫式的人物，所以他认为俄国出现英沙洛夫还有“一些时间”。在屠格涅夫看来，当时的俄国还没有具备产生英沙洛夫的社会条件。更主要的是，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洛夫不是争取社会改造而是争取民族解放的英雄。正因为如此，他将英沙洛夫写成一个保加利亚人，以致使这个艺术形象有点轮廓模糊。

尽管如此，贯穿整个作品的，必须寻求有高度实践精神和献身精神的青年，来改造俄罗斯社会这一中心思想，在当时的俄国是有深刻的积极意义的。正因为这样，《前夜》很快在俄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前夜》在艺术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它以叶琳娜的探索为中心线索，围绕这个线索，展示各种人物的性格，揭示俄国社会的矛盾和发展方向，故事脉络清晰、结构严谨。为了展示主人公典型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作者运用了写传记的方法来交代叶琳娜周围人物的来龙去脉；这些传记的写法，又不尽一样，有的插叙，有的通过人物自身活动，有的用别人的口叙，变化有致，不千篇一律。作者还采用“日记”的形式，用整章的篇幅，让主人公进行“内心独白”，充分披露她的内心世界；这种心理刻画的手法，后来被不少中国作家吸取采用了。

《父与子》

长篇小说《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它写于一八六〇年八月，完成于一八六一年六月。一八六二年发表在《俄罗斯导报》第二期上。

《父与子》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八五九年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暖风轻拂，阳光洒满大地，到处呈现出充满生机，春意盎然的景象。在通往×省玛利因诺的公路上，正奔驰着一辆四轮敞篷马车。车上坐着两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其中一个年龄稍大，长着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淡茶色的连鬓胡子，穿着一件宽大的长外衣，这人叫巴札洛夫。他出身平民，祖父种过田，父亲是个乡村医生。他是彼得堡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另一个是贵族青年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他们是同学。

巴札洛夫正直、诚实，有着清醒的头脑，富有朝气，而且学识丰富，对旧事物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因而深为他周围的同学所景仰；阿尔卡狄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假期到来，阿尔卡狄邀请巴札洛夫到他父亲的庄园里做客。两位青年朋友静静地坐在颠簸的马车上。长途旅行，都有些倦意，只有那马蹄的“得得”的有节奏的声音，打破大自然的寂静。车窗外一幅幅画面，飞

驰般地掠过地们的眼前。路旁村子里，木屋倒塌，谷仓倾斜。农民们都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弱的小马，甚至连那些被饥饿的农民剥去树皮的柳树，站在路旁也像一排衣衫褴褛的乞丐。瘦小的母牛贪婪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阿尔卡狄注视着车窗外这幅萧条荒凉的景象，不由得发出叹息：“不，这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他在思索着，“生活不能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需的。”

一刻钟以后，马车停在一所红铁皮屋顶、灰色墙壁的新的木头宅子的台阶前，这便是阿尔卡狄的家——玛利因诺，又叫“新■”，农民却给它起了一个绰号——“穷庄”。

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基尔沙诺夫热情地带着一副母亲般的慈爱的笑容，迎接两位年轻人的到来，内心的兴奋使他好像有点慌张，又有点胆怯。他头发完全灰白，身子倒结实，不过背显得有点驼。尼古拉是个拥有两千个农奴和几千亩土地的贵族地主。他年轻时的生活很幸福，自从他妻子病逝后，他就过着一种孤独的疏懒的生活。后来，他对田地改革的事情感到兴趣，便动手做起来，建立模范“农庄”；附近的人称他为“赤色分子”。但他的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常以拒交地租，损坏农具，作为对他的反抗，这使他很苦恼。他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回忆幸福的往事，从中寻求安慰；或是沉醉在朗诵普希金的诗歌的意境中以及动听的大提琴的乐曲声中。这是一个性格温和、多愁善感的地主老爷。他用热情的甚至带有几分阿谀的口吻，欢迎巴札洛夫的到来。

这时，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来到了客厅。他看起来大约有四十五岁，中等身材，穿着一套深色的英国式的衣服，系一条时髦的领结。这个举止高傲，有着一副优雅风度的绅士来到了两个年轻人的面前，他从裤袋里把他那粉红色长指甲的好看的手，伸给他的侄儿，口里说：“欢迎。”

尼古拉把他介绍给巴札洛夫。巴威尔以一种对平民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巴札洛夫，他只稍微弯了一下他的柔软的身子，并且微微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札洛夫；他并不伸手给客人，反而把它收回到裤袋里去了。而不拘礼节的巴札洛夫却根本没把这个像古董似的贵族放在眼里。他们从第一次见面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巴威尔年轻的时候是个放荡的纨■子弟，后来成了上尉军官。一个光辉的前程在等待着他。就在这时，他结识了一位美丽而风流的公爵夫人。但他的追求失败了，从此他就萎靡不振，在空虚孤寂中生活着。他长期漂流在外，许多年以后，才回到俄国，接受了他弟弟尼古拉的邀请，来到了玛利因诺寄居。巴威尔和所有贵族地主一样，坚信贵族制度不可动摇的原则，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否定当时的解放运动，否定与他们阶级相对立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

巴札洛夫的到来，扰乱了玛利因诺的安宁，在那些避世而居的贵族地主的生活中掀起了波澜。巴札洛夫从来到这里之后，就集中精力从事科学实验，他从一清早起就去捉青蛙，然后就解剖、研究，整天坐在他的小屋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有时他也和仆人的小孩在一起，回答孩子们所提出的各种天真的问题。这里的佣人也都喜欢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他们的同类，而不是老爷。可是他那平民的气质和藐视贵族的态度，却使巴威尔感到威胁。巴威尔憎恶这个“学医的家伙”，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贵族气质受不了巴札洛夫的冷淡”。

一天，巴威尔问阿尔卡狄：“巴札洛夫是怎样一个人？”阿尔卡狄是这样回答的：“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他不服从任何权威，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出于贵族阶级的本性，巴威尔清楚地意识到他与巴札洛夫是势不两立的，他用心灵的全部力量来憎恶他。而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却与巴威尔有些不同，他认为巴札洛夫博学、有才干；巴札洛夫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也常常吸引着他。有时，他悄悄地来到巴札洛夫的小屋里，细心地看他做实验。但巴札洛夫的到来，使尼古拉在精神上也感到压力，并且还担心巴札洛夫给阿尔卡狄的影响是不好的。有一天，巴札洛夫在细致地考察了尼古拉的庄园后，对阿尔卡狄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但他落后了。”说这话时，正好被尼古拉听见了，他足足站了两分钟才悄悄走开。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过去，他哀叹着对巴威尔说：“都是落后的人了，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也许巴札洛夫是对的……。”可是，巴威尔却不认输，他说，我却 not 这么容易认输投降……我看得很清楚，我要跟那个学医的家伙打一仗。”

果然就在这天傍晚喝茶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交锋。这天，巴威尔走进客厅，就已经准备好作战了。他只等找一个口实就向敌人进攻，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巴札洛夫和往常一样，这个傲慢不羁的平民知识分子打心眼里藐视这些贵族地主，他从来都厌烦和他们辩论。他并不热衷于宣传自己的主张，他重视的是实践。因此，这一天，他照例在“老基尔沙诺夫”们面前不多讲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茶，不说一句活。巴威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最终他总算找到了一个开战的机会实现了他的愿望。

当他们的话题转到了附近一个地主身上，巴札洛夫随口轻蔑地说：“没有出息的下流贵族”，这直接触怒了巴威尔，他气得嘴唇在打颤，于是将自己对巴札洛夫的满腔的仇恨和怒火一古脑倾泻出来。他振振有辞地向巴札洛夫发动了攻击，大肆颂扬他所崇拜的英国的贵族制度和他们的美德。他狠狠地对巴札洛夫说什么，英国的自由是贵族阶级给它的，也是由贵族阶级来维持的。他警告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巴札洛夫毫不示弱，他面对着那个外强中干的论敌，给以有力的驳斥。巴札洛夫指出，一切的贵族地主都是寄生者，没有行动的力量，所以，他们是不值得尊重的。请看下面这段富有戏剧性的对话：

巴札洛夫：“目前最有用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

“否定一切。”

巴威尔：“怎么，不仅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巴札洛夫：“一切。”（巴札洛夫镇静地再说一遍）。

巴威尔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这虽然采用的是含蓄的笔调，但可看出巴札洛夫对现存政权和农奴制度的彻底否定。巴札洛夫在争论中表现了他的非凡的气概，把巴威尔驳斥得张口结舌、无言可对。

在另一次争论中，巴威尔又挑战似地问巴札洛夫是否也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这无疑是在暗示着国家、财产、法律以至宗教等等，巴札洛

夫不直接回答他，而反问道：“这是审问吗？”巴威尔的脸色不禁为之变白。巴札洛夫相当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否定贵族制度，在于破坏旧世界，还在于改造社会，组织合理的社会。因而他无情地揭露贵族自由主义者的伪善；他嘲笑巴威尔自诩为自由主义者，也不过是每个月里帮忙使一个农人少挨一顿打。一次，他曾慷慨激昂地驳斥巴威尔说：“我们整个忙着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我们白费时间谈论……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却是我们每天的面包。”巴札洛夫就是这样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实践、反对巴威尔那种抽象的空谈。他们的论战，常常引起尼古拉的不安和阿尔卡狄的埋怨。阿尔卡狄总是站在基尔沙诺夫老一辈们的一边，反对对他父辈们的轻蔑和嘲笑。在他看来，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审判父亲的。所以，阿尔卡狄也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软弱的、爱自由的少爷。巴札洛夫常常和他发生争论，并批评他的贵族习气。有一次，他批评阿尔卡狄说：“你不会战斗，你却以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可是我们却要战斗。”在这个贵族之家里，巴札洛夫孤军奋战，他充满信心，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

有一天清晨，巴札洛夫在花园的凉亭里偶然遇见了尼古拉的情妇费尼奇加。她是个二十几岁的美丽的少妇。他虽是老爷的情妇，但没有因为受地主的恩宠而变成一个庸俗的地主太太。由于她出身平民，她很自然地对巴札洛夫这个没有绅士气派的医生产生好感。在她看来，巴札洛夫是一个朴素的人。他博学，有才能。他们的接近，引起了巴威尔的嫉妒。因为巴威尔在费尼奇加身上，发现了他早年失去的恋人——公爵夫人的幻影而深深地迷恋着她。他总像影子似地窥视着她的行动。当他发现巴札洛夫和费尼奇加接近，这就成为他对巴札洛夫展开新的挑战的导火线，于是他布宣与巴札洛夫决斗。实质上，这是巴威尔与巴札洛夫思想矛盾尖锐化的反映；这表明，巴威尔要做最后的挣扎，与巴札洛夫决一死战了。

巴札洛夫认为决斗是很荒唐的，但他还是毅然接受了巴威尔的挑战；他决心以决斗对巴威尔做最后的裁决，打破他对自己力量的迷信，戳穿他在虚荣心掩盖下的虚弱本质。

决斗是在一个明媚清新的早晨进行的。浅蓝明净的天空飘起几片彩云，晶莹的露珠撒满在草茎和树叶上面，银子似地闪闪发光。百灵鸟的声音打破了这清晨的宁静。巴札洛夫一早就来到了他们约定的树林里等待巴威尔。决斗开始，尽管巴威尔抱着决心打死对方的阴暗心理，抢先瞄准巴札洛夫开枪了，但他到底是一个空虚的躯壳，失去了精神力量的支撑，他射出的仇恨的子弹，从巴札洛夫耳边“嘶”的一声擦了过去，没有打中；镇定自若的巴札洛夫并没有瞄准，就打伤了巴威尔的大腿。巴札洛夫无心打死他，只是用子弹摧垮他那虚弱的精神堡垒。巴威尔负伤后，巴札洛夫没有忘记医生的义务，为他验伤并看护他。

决斗宣告了巴威尔的彻底失败。他为他的高傲、为他的失败而不满意自己，但他无论如何不肯跟巴札洛夫和解。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落后的人”，自己的贵族派头同社会气息太不调和了。从此以后，巴威尔就离开了祖国，在孤独和寂寞中，消磨余生。

巴札洛夫告别了基尔沙诺夫贵族庄园。

巴札洛夫在城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认识了贵族阿金左娃夫人。

阿金左娃是一个美丽、聪明而又有教养的贵妇人。她身材修长，有着一双聪慧而明亮的眼睛，在她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亲切而温柔的力量。她的不平

常的生活经历，使她不同于一般只沉溺于庸俗享乐的上流社会妇女。她自幼生活在一个破产的贵族家庭里，二十岁时，被一个富豪阿金左夫看中了，那是一个四十六岁的古怪的忧郁病患者。他们同居了六年，阿金左夫临死把全部财产都遗留给她，从此她就在乡下一座富丽堂皇的宅子里，过着清闲而安逸的阔太太生活。但她没有让光阴在孤寂中虚度，她读了不少好书。她有广泛的兴趣，但她没有迷醉。她虽没有一定的偏见和坚定的信仰，但她也从来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对许多事物她都看得很清楚。当她与巴札洛夫相遇后，这个有着渊博的知识，敢于否定一切权威的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温厚和真挚。他们第一次见面，尽管巴札洛夫有点儿■促不安，但还是同她从容地、活泼地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并接受了她的邀请到她家去做客。

三天后，巴札洛夫和阿尔卡狄应邀来到了离城四十维尔伏的尼柯尔斯柯耶村。阿金左夫的庄子座落在—座倾斜的、没有掩蔽的小山上，这是一所有绿色的屋顶、白的柱子、富丽堂皇、陈设精雅的宅子。女主人热情的接待，在巴札洛夫心中产生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喜悦。她的美貌、聪颖和她的“独立的性格”，还有那不同凡俗的风度，引起了巴札洛夫的爱慕。他认为她是一个有脑筋的人，“她还经历过人生”。而阿金左娃也喜欢倾听巴札洛夫那富有独创性的精辟的见解和犀利的谈吐，虽然她很少赞同巴札洛夫的意见。有时巴札洛夫的言论激怒了她或触怒了她的趣味和高雅的习惯，她也不怪他。她显然是对他发生了兴趣；而巴札洛夫也是如此，他需要爱情。他沉浸在对阿金左娃的热恋之中，但这种感情使他痛苦、也使他愤怒。照他自己说，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是荒唐的、不可宽恕的愚蠢，这种矛盾心理折磨着他。

一天，巴札洛夫同她在花园里散步。他突然声音抑郁地对她说，他打算不久回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她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好像有什么东西刺疼她的心，使她自己也觉得惊奇……就在这天晚上，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阿金左娃对巴札洛夫倾诉自己没有生活欲望和生活热情的苦恼；巴札洛夫清醒地看出，这个坐在天鹅绒椅子上，满身花边的贵族太太在卖弄风骚，寻求感情刺激。然而巴札洛夫及时转过背来。他还是向阿金左娃吐露了心底的秘密，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这种冒险的尝试，在巴札洛夫心里并没有产生第一次表白爱情时的甜蜜，反而在他心中产生强烈的、痛苦的激情。他遭到了拒绝。巴札洛夫经历了感情和理智上的严酷的斗争。他并不了解阿金左娃，她虽然有时对贵族生活感到厌倦，但她害怕破坏这种平静的、悠闲的生活。在阿金左娃看来，“上帝知道这会引来什么样的事情来，这是不可轻易玩弄的，无论如何，世界上最好的还是平静。”贵族的地位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不能逾越贵族道德所能允许的界限。巴札洛夫的到来，只能满足她一时的好奇心，并不能使她对巴札洛夫产生真正的爱情。

爱情的失败，尽管给巴札洛夫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主要的是他不满意自己。唯一使他自慰的是他虽然爱阿金左娃，但他没有对她说恭维话，没有停止对她的贵族气派的攻击；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骄傲，当事实证明阿金左娃并不爱他时，他忍着内心的痛苦，毅然离开了阿金左娃。后来，巴札洛夫第二次到阿金左娃家时，他早已恢复了理性。阿金左娃虽然挽留巴札洛夫住下去，然而，巴札洛夫却非常理智地告诉她：“谢谢你留我住下……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在不是我自己的圈子里，耽搁得太久了，飞鱼能够在空中支持一个时候，不过它们不久就得跳回水里去了，请你也答应我回到自己原来的环境

里去吧。”这时，阿金左娃望着曾经爱过她的巴札洛夫，她可怜他，便带着同情地伸出手给他，可是巴札洛夫后退了一步说：“不，我是一个穷人，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受到别人的周济。”他讨厌这位图清闲、爱幻想的贵妇人对他的同情的怜悯。他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父母的家中。

巴札洛夫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他的到来给他年老的双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欣慰。他们用颤抖的声音喊着“叶纽沙”，特别是巴札洛夫的母亲，这个又胖又矮的老太太，用幸福的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的爱子。她眼里表示的不只是深爱 and 温情，那里还有忧愁。

巴札洛夫的父亲瓦西里是个乡村医生。他不惜花任何代价来完成儿子的教育。巴札洛夫是他的希望和骄傲，他认为像他儿子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用平常的尺度来衡量的。他的母亲阿丽娜性格温厚、心肠善良。两位老人家无微不至地关心儿子。母亲为了给儿子装饰屋子，从邻居那里讨了一点花来；父亲则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去找管家季莫费以奇商量，用他那打颤的手掏出一张一张破钞票，差遣季莫费以奇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关照他买好的饮食……可是巴札洛夫对自己的父母却有些过分的严峻和冷漠。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郁闷，他狂热地工作。但不久，工作的狂热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他常常到村子里去和农民谈话。但农民并不理解他，因为他所探讨的什么农民的人生观，以及俄罗斯的力量和将来等等问题，并不是农民所关心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土地问题、面包问题，因此，农民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和善的老爷，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罢了。

在这乡村的沉闷的日子里，巴札洛夫常常帮助他父亲给人治病。有一次，附近村子的一个农民患伤寒，很快就死了。巴札洛夫在解剖这个由于伤寒病致死的尸体时，不慎割破了手指，受了病菌感染。巴札洛夫在和病魔搏斗中是坚强的和勇敢的。他挣扎着，后来由于高烧，他整夜都是在一种半昏迷的睡眠状态中。年老的双亲悲痛万分，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守护在他的身旁。整个宅子似乎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只有巴札洛夫自己在清醒时，冷静地、清楚地了解：一桩极不幸的、意外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即将发生。他挣扎着，他想“一个老年人，至少还有时间从容地跟生命分离，可是我……我还要办那么多的事情，我不要死，我还有使命。”

但是，死神终于征服了他。就这样，一颗热烈的、反抗的心停止了跳动；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结束了他的一生。他被埋葬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墓里。他的双亲常常互相搀扶着来到这座坟前，悲恸地为早逝的爱子祈祷。全书以衰老的双亲恸哭在巴札洛夫的墓前而结束。

《父与子》的情节开始于一八五九年五月，结束于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这个时期，俄国“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同农奴制及其残余的斗争”，在这个社会经济条件下，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代替了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终于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这个背景上，展开了《父与子》的故事情节。

《父与子》尽管也描写了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某种疏远和隔阂，但是它的

基本冲突并不是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札洛夫与贵族地主巴威尔、尼古拉等人之间的两种社会力量、两个社会阵营的冲突。通过这个冲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最本质的矛盾冲突。

巴札洛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那时刚刚产生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这个形象是屠格涅夫对知识分子长期观察和艰苦探索的结果。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把主人公放在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之家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特征和故事的冲突迅速展开。通过他与巴威尔之间一系列——政治、科学、艺术、哲学、道德等方面的冲突，表现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贵族地主阶级已经成为历史的阻力，他们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尽管屠格涅夫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情这个阶级，但他却顽强地遵循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他曾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他把平民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进步力量来描写。巴札洛夫与巴威尔冲突的实质，是要不要改造俄国，要不要改革俄国的农奴制度。由于当时沙皇的检查制度，屠格涅夫不能写得更清楚些，但已经意味深长地表明巴札洛夫是一个敢于反对整个沙皇制度的革命者；是一个改造俄国社会的可贵的实践家。屠格涅夫真实地展示了巴札洛夫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胜利，艺术地表明了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是俄国革命变革时期的英雄人物。这是作者世界观中民主思想的胜利，也是他遵循艺术规律所取得的成就。

巴札洛夫在俄国的出现，动摇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乐观主义，引起他们对自己以及他们奉行的所谓神圣原则永世长存的怀疑。这个艺术形象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但是，由于屠格涅夫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在作品中又表现出作者思想上矛盾的鲜明烙印，这在巴札洛夫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作者一方面写了巴札洛夫在与巴威尔的冲突中，是一个胜利者，一方面却把他看作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他身上只看到破坏的因素；一方面，巴札洛夫反对贵族道德，一方面又让他接受巴威尔的挑战和决斗；巴札洛夫自认为属于人民，但他又不理解人民，人民也不理解他……特别是在作品结尾，屠格涅夫虽然肯定巴札洛夫是个革命者，却又不相信他的理想和事业，否定他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屠格涅夫虽然真诚地希望改革农奴制度，但又惧怕农民革命。他认为在农奴制改革之后，现实已经很理想了，不需要在俄国再燃起革命的烈火，当然也就不需要像巴札洛夫那样的人了。正因为这样，他给巴札洛夫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他过早地死去，让这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巨人，停留在“未来的门口”，这正是作者看不到前途的反映。

与巴札洛夫对立的巴威尔，是一个轻视祖国，匍匐在外国文化面前的贵族地主，典型的西欧主义者。他仪表堂皇、孤芳自赏，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贵族的气息。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惋惜过去和追思虚幻的爱情。他的生活准则是：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过去的原则都不许更动。他企图用贵族的原则和制度来对抗当时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巴威尔对巴札洛夫的挑战，实际上是两个对立阶级的较量。他所与之斗争的不只是巴札洛夫一个人，而是所有否定现存贵族制度的人。最后，他挑起决斗，充分表现了他精神的破产，而且也宣告了他彻底的失败。

与巴威尔一个阵营的还有他的弟弟尼古拉、侄子阿尔卡狄。尼古拉和巴威尔的性格不尽相同。他软弱，缺乏自信，常为自己一代人的过时而惆怅。

他力图在农事中实行某些改革，以便找出一条缓和阶级矛盾的道路，并把这种改革作为维护贵族地主制度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改良不仅不能改变俄国社会，也改变不了他窘困的处境，因此，尼古拉常常流露出一种悲哀绝望的情绪。通过尼古拉和巴威尔的形象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贵族地主阶级的不同的心理和精神面貌。尼古拉的形象，带有作者的思想的某些成分。尼古拉是作者所赞赏的理想的地主形象。尼古拉的思想和他所走的道路，是拥护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正是屠格涅夫思想的反映。

巴札洛夫不仅战胜了基尔沙诺夫家的老一代，也判决了他们的下一代——阿尔卡狄。可见，《父与子》的冲突，并不发生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基尔沙诺夫家的肖子阿尔卡狄，在当时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接受了进步思潮的某些影响，但他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经不住现实斗争的考验，更缺乏行动的力量。在巴札洛夫同巴威尔、尼古拉的斗争中，虽然有时他也站在巴札洛夫一边，那不过是喊些时髦的词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民主主义者而已。他更同情和怜悯他的伯父和父亲，说什么“儿子总不是父亲的审判官”。这表明阿尔卡狄只能是基尔沙诺夫家的温顺的下一代，根本不是巴札洛夫的战友。在作品结尾，阿尔卡狄果然步父辈的后尘，成为一个精明的庄园主，他父辈的现在，正预示了他的未来。

如果说在玛利因诺表现了巴札洛夫性格的基本方面，那么在阿金左娃和他父母的家里，巴札洛夫的性格便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补充，显示了他精神力量的强大，并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阿金左娃虽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但她不满足于平庸的享乐生活。她经历过人生，对社会的冷暖深有感触。她有广泛的兴趣，在生活中她不断地追求，这是她同巴札洛夫互相爱慕的思想基础。但是，贵族阶级的传统道德观念，使她不可能逾越贵族阶级道德所许可的界限。阿金左娃与巴札洛夫毕竟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们最后各走东西，这是符合生活的逻辑的。

巴札洛夫的父母是纯朴的俄国人民的形象。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和幽默的笔调来写这两位老人的形象。通过与他们的关系，表现了巴札洛夫性格的一个侧面。他对双亲虽然冷漠生硬，但却怀着深沉的爱。全书以这对年老的双亲恸哭于巴札洛夫的墓前结尾，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巴札洛夫的哀悼和爱抚。

《父与子》的思想力量是与其高超、精湛的艺术相统一的。它的艺术是服从于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父与子》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它的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写思想冲突，写人物之间的论争。它在艺术上，情节单一，结构朴素、简洁。作品通过三个情节中心——基尔沙诺夫家、阿金左娃家和巴札洛夫父母家，来揭示巴札洛夫的性格特征和表现主题思想。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都自然地编织在这一基本情节之中。

在性格描写上，《父与子》主要是用反衬法，即以相互对立的性格来加以对照和衬托，更加突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巴札洛夫和巴威尔的互相反衬，不仅见于思想观点，而且也见于他们的谈吐和服饰。作者着墨不多，却勾勒出他们鲜明的性格。其次，屠格涅夫常以人物间的争论，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段，这种争论也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巴札洛夫的性格就是在同巴威尔的激烈舌战中，在同阿金左娃、阿尔卡狄的交谈中得到鲜明体现的。再次，作者刻画性格不是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而是以极其简练的语言，通过人物的活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刹那间的心理变化。屠格涅夫不像托尔斯泰

那样，用长篇的内心独白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屠格涅夫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作品的语言生动、优美、清新。总之，这些质朴而平淡的艺术特色融化在深刻的思想和淡淡的抒情之中，构成了一部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作品。

屠格涅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构成了一部十九世纪四十——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的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四十年的艺术实践是紧密地与俄国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他对生活的积极探索，使他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重大的社会主题，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形象。但是，当他脱离现实斗争，远离祖国时，他的创作就出现危机。屠格涅夫的艺术实践证实了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土壤，脱离生活将使艺术枯竭这样一个真理。这个真理，直到今天对我们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的精湛的艺术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俄罗斯乡村生活的风俗画。他的明快而质朴的风格，浓郁的抒情因素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屠格涅夫不仅是俄国的伟大作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在西欧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十九世纪法国短篇小说家乔治桑，称屠格涅夫为自己的老师，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导师，我们大家都应该向您学习。”有着“短篇小说之王”称号的法国大作家莫泊桑，称屠格涅夫为“伟大人物”“天才小说家”。

屠格涅夫也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早在三十年代前后就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他的纪念屠格涅夫的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说：“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因为我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在我国老一辈作家中，不仅郁达夫，还有茅盾、巴金、丁玲等，早年都接受过屠格涅夫的影响。丁玲早期作品的心理描写，就深受屠格涅夫短篇小说《人心》的影响；巴金一直是屠格涅夫作品的积极的翻译和介绍者。直到今天，屠格涅夫的作品仍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

加里宁曾幽默地说：“凡是不想使自己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愿我们的作家多多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和份量，从屠格涅夫作品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学习他的艺术技巧，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

